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57 期 2018 年第 4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林振寿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福州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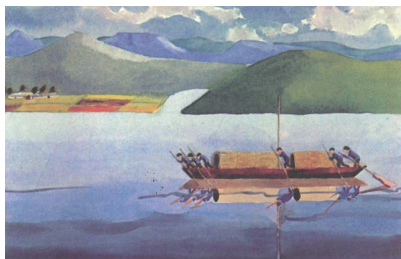
P9



严复长孙女和严复翻译奖

P45

一位美国医生笔下的福州乡村旧景



世味流年

4 葛水平 福州的背景

闽都译才

9 林本椿 严复长孙女和严复翻译奖
14 于 丹 宇宙学家故园情
——霍金学生吴忠超采访记

岁月如歌

21 马星辉 松绑
27 景 艳 尚干七里 青春如炬

左海风流

33 闽 文 一则迟到了六十年的讣闻
36 简福海 一炉香·生命的引渡
42 王国栋 庐隐的月下老人

双塔视野

45 许维勤 一位美国医生笔下的福州乡村旧景

Contents

P53



回望洪塘故乡

P60



留在故事里

P81

方山问茶记



走笔洪塘

- 53 邱泰斌
60 杨少衡
65 唐 冈

- 回望洪塘故乡
留在故事里
书生本色

闽都记忆

- 68 林 山
71 陈 三
76 小 山

- 旧物新拾
鼎边糊和碗糕
光的饼

福地山水

- 81 三米深
88 鹿 野

- 方山问茶记
心有牧场在山巅

史池钩深

- 92 林秀玉

- 闽都文化与千年摩尼教

- 封二 刘 瑛
封三 杨双伟

- 坊巷韶华
言师采药去

福州的背景

葛水平

我一直认为福州是一个冬天穿得住单衣的地方。

冬天的福州还是需要添加一件厚衣来裹住体温。

—

福州的三坊七巷我已经走过两次了。这一次

是春天，天解风情，从三坊七巷望天空，蓝，悠然而放任，这在北方，我是不敢想的。置身于此，不由得就会想，曾经的城市有许多这样的老建筑，老，就这么懂事，为你合理制造了一个反向意义的繁华。不客气，凡是有感情的人都想往这样的老地方走走。

有许多手艺人出生在这地方。在千篇一律的历史回眸中，多想想手艺人事情，能够得暇





福州脱胎漆器

开个小差，呼吸一下环佩叮当的历史，确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旧时的福州三坊七巷出过许多世家，牵扯我的可能是福州的脱胎漆器。脱胎漆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北京景泰蓝并称为中国三大著名手工艺品。三坊七巷就住着脱胎漆器沈氏世家。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人只有在破落时才

知道学会用手艺吃饭。福州脱胎漆器是继承古代传统优秀漆文化发展起来的。装饰技法丰富多样，色彩明丽和谐。郭沫若生前曾作诗倍加赞誉，称赞福州脱胎漆器是“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脱胎漆器的制作是先以泥土、石膏、木模等制成胎型，以生漆为黏剂，用夏布（苎麻

布)绸布逐层裱褙,阴干后脱去原始模。此谓之布坯。另一种是木坯。两者皆要在坯地上经过上灰、打磨、髹饰研磨,再加以纹饰,使之成为绚丽多姿的脱胎漆器工艺品。它的传统装饰技法有黑推光、色推光、薄料漆,还有彩漆晕金、锦纹、朱漆描金、台花、嵌螺钿等。

作家荆歌在福州淘了一件福州漆器,拇指大小的狮子,耐看得很。是不是福州三坊七巷流落出来的手艺不知。几十年来,社会变迁如同中国式的标语,变换之间,时间已逝。沈氏世家最后的掌门人是一位女人,用不婚嫁来守着脱胎漆器终老。可惜女人从来没有娘家的代表权,这也说明在沈氏家族,一个“女”字,如搬不动的大山,阻挡了脚下路途。她虽身怀绝技,但因妇女地位,终难实现沈氏世家脱胎漆器的中兴。

站在雾霭中想象消失于远方的风景,像一个长卷轴的画卷。无论是福州,是三坊七巷,还是脱胎漆器,人类不能将之视为自己的财产随意处置,要心怀虔敬地看守好属于大家、属于未来的资源,谨慎地利用自己可支配的那部分,保护好灵魂,不要让灵魂失去感动。

能够完好保存下来的三坊七巷,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不仅仅是在纸上、在传说中。曾经饱经沧桑,但和那些新鲜玩意儿相比,福州的历史文化在众多人士的保护关怀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悠闲去处,以利之后的福州往来者直奔主题,怡然访古。

二

只是匆匆一掠。

初冬,沿途风景不俗,一条闽江,江岸上,一大片平坦的田野,潮湿的雨落下来,滋润着青苔和一些羊齿植物,虽然小寒将至,仍旧那么葱绿。

我们沿着闽江去看一座“满城”。各地的“满城”布局特点不同,但凡旗人驻地都不设围墙。他们讲究风水,把抽象的阴阳、五行生克的概念具象化,使其房屋、山水、风向、阳光都显得井然有序,并相信这种排列会产生趋吉避凶的神秘力量。福州琴江的“满城”,突显的是它的军事功能。这里街巷横竖交错,时而紧闭,时而相通,外人初入此地如坠迷魂阵。而且街巷往往隐蔽着一块大小不一的空地,是设下伏兵的地方,倘有外敌入侵,疑惑这里是否还有通道时,已经遭到伏兵围剿。所以,它的布局体现了一个军事城堡的特征。

琴江的旗人,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海疆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并屡立战功。因为他们早已与清廷绑在一辆战车上,精忠报国是他们的使命。

现在的村庄是安静的,虽然有重重叠叠的回忆不时在角落里闪现,但是,对于战事,或许也只有年节时才会想起祭拜。和大多数村庄一样,“满城”里都是一些留守老人,有的打麻将,有的剥花生,“第喜门”紧闭着,门两边贴着对联,

洋溢着辞旧迎新的喜悦气氛。

我在“满城”看见了一只炉，上方写着“惜字炉”。古人认为字是有灵性的，写过字的纸随地乱扔是罪过的，是对孔圣人的不敬，践踏地上的字纸会遭到恶报。无用纸张上只要写了字就一定得投入“惜字炉”焚化，这种行为被称为“敬惜字纸”，是一种风俗。敬惜字纸的风俗，据说从宋朝就开始了，明清尤为盛行。尤其在一些人口聚居的村落、读书人比较多的村子里，都会建有惜字焚纸炉。有些地方会成立叫“纸炉会”的组织，每到年底，“纸炉会”的成员就四处收集字纸，挑选吉日集中到焚纸炉焚烧，以示对文字、对知识、对孔圣人的敬畏。

池莲师太在《自知录》中甚至写道：“拾路边字纸火化，百字为一善；遗弃字纸不顾，十字为一过！”在旧时福州，每当夜幕降临，总会有

些身背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手持火钳的拾遗人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细心寻觅着散落在街道上的字纸钳入纸篓，俟纸篓装满后，走到尖塔式的惜字炉旁，将纸篓里的字纸倾入其中进行焚烧，并小心地将纸灰盛入锦囊，待到黄道吉日，风和日丽之时，与福州社会名流云集闽江边，举行隆重仪式，将纸灰撒入闽江，为文字重回江河母亲的怀抱饯行。

现在已经没有人敬惜字纸了。上苍赐福给人类时，也常常是最大的讨债主，过分索取的暂时欢乐，恐怕已经生成祖债孙还。

三

“千秋万岁，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日子，化鹤重来一次。”这是郁达夫离开鼓岭



福州马尾琴江村



如今已经熄灭的“惜字炉”

后写下的一段话。好，总是和生活很近。

去往福州的“鼓岭”，有雨陪伴，雨下得大时，车停在了村子路口。我首先看见的是树，粗壮有力，真是绝妙的景致。鼓岭在福州鼓山之上，站在岭头上可看见福州城市，可看见大海。岭上有避暑别墅，多达 300 多处。

鼓岭上是有故事的。早时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鼓岭上修建了第一座别墅，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由外国人发起建设的中国避暑度假区，之后更有一个福州人尽皆知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一个来自美国的叫加德纳的人，他从 10 个月到 10 周岁，随父母在鼓岭上度过了 10 年的夏日时光。幼童的味蕾最易被俘虏，肠胃的故乡一直停留在鼓岭。更感人的是，从 10 年后回到美国，一直到去世，他念念不忘鼓岭。

鼓岭的好与生活有关。街道的摊位上摆放着

各种生活所需，一个简易的塑料瓶子敞着口，你若需要请往塑料瓶子里投钱，东西拿走，一切只有两个字：“诚信。”同行作家兴安买了一柄笊帚，五元纸币投放进去，他想用笊帚画蒙古马一身风雨征程的雄姿。

我喜欢鼓岭上的这种生活姿态，闲适，自在，不猜忌。

作家马原在鼓岭采集了一大把薤菜，他要种植到云南。极简的生活里，他养殖、种地、写作。我能够想象他弯腰下去的样子。也许，人类社会的发展会是另一番模样，但是，远望十万烟灶的城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中忖度一下，是否还闻得到一滴水的香气。

鼓岭上走走，如同在梦的芳草地徜徉。

这一天的鼓岭，雨是最繁忙的，植物因雨而疯长。



严复长孙女和严复翻译奖

林本椿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于1898年正式出版，今年是120周年。如果说严复是最早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和思想家，那么他的长孙女严倚云则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一位杰出学者，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严倚云 (Isabella Yen) 1912年7月16日生于北京，生父是严复的族侄严培南（君潜）。在福建老家，严复见小时的严培南聪明，就把他带到天津读书。严培南1895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驾驶班，经严复推荐到通艺学堂任教。191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又聘他为京师大学堂数学系教授。此时，严复长子严璩（伯玉）年近四十，膝下无子女，严复提议把严倚云过继给严璩，就这样严倚云成了严复的长孙女。

严璩早年游学英国，曾任广东省电政监督，



捧着严复像的严倚云

驻法国使馆参赞。1909年，任福建财政监理。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几度出任财政部次长，以及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查总所总办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与日本人轮番劝说他出任伪财政部长，还设下圈套逼其就范，严璩誓死不从。1942年冬，严璩在上海辞世。严倚云3岁时，一次从楼梯上摔下，脊柱骨折，留下终身残疾，体弱多

病，身材也矮小，写字、端茶杯、拿筷子都很困难，一位医生告诉严家说：“这孩子最多活到15岁。”可是15年的时间过去了，她还活着，以后的光阴都是她用坚忍不拔的精神向老天爷借来的生命。后来她还得过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和红斑狼疮等病。她乐观地说：“借来的生命本来是用在为大家谋福利的，所以见事就赶着做，只要事情做成功就满意了。”

小时候，因为小瓷猫玩具被人拿走，严倚云大哭了一场。祖父严复对她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别人偷不去、抢不走的，那个最宝贵的东

西不是别的，就是学问。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别人都可以从你手里拿走、偷去。世界上任何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宝贵的。学问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所以最宝贵。正所谓‘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不过，这最宝贵的用再多金钱买不到的而又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只有自己努力学习才能得到。”严倚云把这件事和这句话牢记心里，从此一心向学。13岁那年，她考入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北京圣心女校，主修英文、法文两科，兼习钢琴、油画。17岁，她就在多处兼课，半读半教。20岁，通过法文考试，获得法国政府



严倚云曾经就读的西南联大旧址



严倚云和高叔弼夫妇

颁发的文凭，成为她能任教于西南联大的资本。1934年她考入北大，是当年北大录取的六个女生之一，主修教育，辅修英语。在2008年郭建荣主编的《北大的才女们》中，她名列12位才女中的第三位。1938年，26岁的她毕业于西南联大。

2

1947年，严倚云35岁时应聘赴美，任教于纽约州立师范学院，与此同时，还到奥尼昂塔兼职。她说：“奥尼昂塔在纽约州，但好像离纽约市很远很远。在最大的食品杂货店里也买不到酱油。”这没关系，严教授坚持和她的六年级学生白手起家制造中国东西：筷子、算盘、中国拖鞋。她教学生学中国字，介绍中国民间故事，把这些故事改写成短剧在学校里表演。有一年，她的学生在学校体育馆为奥尼昂塔的市民办了中

展会，卖中国纪念品，展示中国烹调和食谱，还有如扭秧歌等中国文化表演。学生能讲流利的汉语，让奥尼昂塔的市民大为惊叹。

39岁时，严倚云再入密歇根大学攻读语言学，一入校门就通过了博士必考的法文考试。学费来源除奖学金外，还是老办法：兼职教书、校对、保姆、电话售货员、宿舍的大厨等。半年后，她获得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翌年又考入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严倚云在康乃尔大学苦读了4年，44岁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语言学的博士。其间，她还出版了专为中国留学生编写的《英国话》，帮助中国留学生学好英语。有一次，严倚云参加康乃尔中国留学生的智力测验游戏，测试游戏的主持人，设置的一等奖为一把制作讲究的烟斗，因为谁都以为获得冠军者一定是一个男学生。严倚云偏偏随手折桂。当她接过大烟斗时，众人开颜大笑。

严倚云在南加州大学期间，一切都很好，但许多中国同胞认为美中不足是还没成家。她说：我要是想结婚，早就结了；我的标准不高，可是很难，我要的是一个相亲相爱的伴侣，其他都不是问题。当时胡适先生还在美国，他十分欣赏严倚云的个性和毅力，于是为她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世交子弟——天体物理学家高叔弼（Dr. Shu-Koo Kao）。其父高梦旦是福建长乐人，曾任商务印书馆馆长，是胡适的好友，也是严复的挚友。他俩在1960年结婚，其时严倚云已经48岁。婚后他们经历了一年的两地分居，高叔弼从东岸来

到离洛杉矶几十里的一所学校工作，虽然只能在周末见面，但他们对生活都很满足。岂料 1962 年刚开学不久，严倚云得了红斑狼疮，医生要她一个月内离开洛杉矶到没有阳光的地方去生活。西雅图倒有半年以上阴天小雨，也许是太阳光最少的城市，于是他们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严倚云成为华盛顿大学远东系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教授中文和语言学，一共工作了 20 年直至退休。她认为学生不能仅仅学语言，而是要学习与语言相关的文化。她对学生们说，语言不能在文化真空中学，相信你们都有机会读过几本有关亚洲文学传统的书，学习语言文化不仅能增强对遣词造句的认识，而且使你们深入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系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学习文学、历史和文化。她经常和学生在一起，常请学生到她家吃饭。她的中英文能力令人称奇，据她的学生回忆，她可以用很恰当的对等英文解释几乎任何一个中文短语。当学者是一回事，能引导青年的学者更是无价之宝，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严倚云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学者。

3

1991 年，严倚云和夫君高叔弼教授捐资 43 万美元，在华盛顿大学创设“严复翻译奖基金”和“严复奖学基金”。前者用于奖励在学术性刊物上刊登由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教授组成评委

会选出的该系学生“中译英”最佳作品的作者；后者奖励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特殊兴趣，并关心人类福祉的学生，以继续她的未竟事业。笔者 2017 年 4 月到华盛顿大学访问，还见到每年获严复翻译奖的名单。

严倚云对传播中国文化和搭建中西文化桥梁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和贡献。

在美期间，严倚云发明了高效、先进的教学方法。有一次，她带着 30 多名学生上山活动，约法三章：活动期间全部吃中国餐，讲中国话，不可用英文交谈。活动持续了两天，大家享受到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了中国文化的大餐，中国话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她还用演中国戏的办法普及中国话。有一次，演的是欧阳予倩的《野玫瑰》，演员都是洋学生，可说的中国话四声分明，抑扬顿挫，连中国人都自叹不如。

亚洲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康达维教授认为，严倚云教授在华盛顿大学服务数十年，一直是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称赞她开创了语言教学和训练助手的新方法。《世界日报》刊登文章说：“严教授宣扬中华文化巨细靡遗……严教授卓越的表现，多次获得各项荣誉……她毕生献身教育，循循善诱、春风化雨，造就人才无数。每次至语言学会宣读论文，以一东方矮小残障之女性，置身于高大白人聚会中，以英语、法语舌战群儒！答辩问难，侃侃而谈，与会者莫不为之惊讶。”严倚云的祖父严复先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而她则致力于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殊途同归，同样是伟大的。因此，更多的人认为她是“放射着女性光辉的巨人”，是“一生为中西文化搭桥的女性”。

严复先生弥留之际的遗训是：“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严倚云把祖父的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她说：“人皆可为尧舜，只看为不为。”她是用十二分的热心去为群众服务的。严倚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语言学的时候，本来可以接受AEC救济金，但她主动放弃了，以便让那些初到美国，不允许打工、又无力解决学费的中国学生得到名额。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就得到

过严倚云的帮助。她说：“严姨助人，对象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不相干、没见过面的人也照帮无误。”“她眼里有数，不等人开口，看到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帮一把，事后也不居功……像严姨这么热心肠的人是不多见的。”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总喜欢找严倚云帮助解决。她或介绍临时工作，让他们赚取学费，或找其他同学合租房子，帮他们减少开支，有机会时则帮助申请奖学金补助金，有时还解囊相助。一次模拟总统选举，一个学生写上严倚云的名字，投入票箱。此事传开，严倚云被称为美国的“一票总统”。

严倚云到美国后。先后任康乃尔大学研究员、讲师，南加州大学助教，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全美外国语荣誉学会副主席，世界教育荣誉学会分会主席等职，且被选为美国国防奖学金及外国学生学费奖学金审查团成员，一干就是十几年。她曾两次受邀作为贵宾，参加美国总统的国宴和美国成绩卓著的妇女一年一次的盛会。其名字被载入《美国学者名人录》《美国教育家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等，先后任美国东方协会西海岸分会、华人服务社、陆荣昌博物馆、华盛顿州亚美协会等社区组织的董事。还担任过全美外国语荣誉协会副主席、世界教育荣誉学会分会主席，并获得福尔布莱特奖金。

1991年10月26日，80岁高龄的严倚云完满地画上了人生的句号。追思会上，到会的亲友、学生、同事、社会贤达二百余人，大家称她为“出山的泉水”，甚至认她为“众人的母亲”。

宇宙学家故园情

——霍金学生吴忠超采访记

于 丹

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有一颗命名为“福州”的星星，它是太阳系内小行星 1997 WD30，介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国际永久编号为第 15001 号。

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这一决定既表彰福州作为著名天文学家家乡的荣誉，也表彰这些探索灿烂星空的人们。他们是我们引以骄傲的乡贤，而他们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星星。

霍金的学生——宇宙学家吴忠超博士，便是其中之一。吴忠超跟随霍金研习宇宙学，研究方向为极早期宇宙。在霍金的指导下，1984 年吴忠超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5 年他与霍金合作的有关量子宇宙学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学通



年轻时的吴忠超在梵蒂冈天文台

信》上发表。此后，他的兴趣一直专注于时空的维数，连续在同一刊物发表过 4 篇论文，并因此获得 1985 年美国引力基金会的第 3 名论文奖。2001 年，吴忠超利用超引力量子宇宙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证明了可观察时空的四维性。2001 年，他应邀在浙江工业大学创建了天体物理研究

所。

与很多福州籍的知识精英一样，吴忠超博士也是寒门子弟，老家在福州新店战坂乡。据《闽都记》，“东室山在四都，俗称吉头。战坂在吉头，去城东北十里而遥。相传五代晋开运三年（946年），南唐兵与李仁达鏖战于此，垒之址，犹存荒莽中”，即是此古战场。村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峰正境，又称战坂境，便是纪念当年保卫家乡的将军李仁达。战坂境门前的千年古榕，更被列为市一级保护单位。今天，战坂境和千年古榕成为寻找原战场的唯一标志物。从此地向南约500米处，便是坂中村吴厝里——吴忠超的老家。

千年后，硝烟飞作残云不知所终，腥风逝为烟霞荒垒已平。当吴忠超出生之时，前世是古战场的战坂变成了茉莉花海——福州茉莉花主要产地。

小忠超在茉莉花海中长大。从他的祖屋极目四周，是一片绿白相间的茫茫花海。确实是“环佩青衣，盈盈素焉，凌风无限清幽”；确实是“荔枝香里玲珑雪”；确实是“千亿小芙蕖，清香最有余”；确实可以催诗人好诗，给美人添香；宜怀人，宜清梦。

但是（生活中往往有但是），花农必须采到花卖给茶商才能谋生，这便是我们所有吟颂茉莉花、喝茉莉花茶的公众的一个大大的盲区。我真为自己的无知羞愧：原来，在炎炎夏日酷暑中，花农们要从凌晨采到中午。接着，在最炎热的午后，再补摘那些迟开的。这不就是杜甫诗中描绘



摘花篮（小竹篓）

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吗？而茉莉花的价格多少？在最好的年成，最好的茉莉花一斤也卖不出多少钱。茉莉花又很轻，装满花篓的花也没有多少。

为了生计，小忠超不得不从5岁起就随着兄弟们进入茉莉花田劳动。

在玉骨如雪的茉莉花海中，幼童们不是背诗，不是唱歌，不是跳舞，而是用机械的动作重复三个字要诀“快准稳”——摘花时，不能使花枝颤动，因为花枝颤动会影响下一个目标。摘花工的一只手伸向目标时，眼睛和另一只手必须瞄准下一个目标。这就要求，眼不看花篓，手要准确地扔花进去。白花花的骄阳下，摘花还要分清绿色的花托和白色的花，必须一并摘下，一是可以增加重量卖钱多，二是没有花托，晚上花蕾就不会绽放，制茶时香气打折。

五六个小时的高难度劳作后，还要将花送到两里路外的西垄村，趁着骄阳才能卖到好价钱。

活脱脱是白居易描述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虽然，闽籍精英群体的成长过程大多相似，“寒门苦读始，名满天下终”，但我还是深深震惊了。在这么强体力的劳动之下，5岁的小毛孩心里会想啥？

挥汗如雨吗？满身叮人的小蠓子虫吗？眼花肚饿吗？对于小忠超，这只是人生的第一课——忍与耐。这一课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吴忠超至今不喝茉莉花茶。

但是，富饶的大自然对穷孩子还是慷慨的，使得他们远离矫情、娇惯，以及父母的过度期盼，却与大自然更加融洽。比如，吴忠超记得，在采摘花的空隙间，父亲如何用绳子绑在他腰间，在岸上牵着，让他在池塘里学游泳。

今天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到，当年乡村的黄昏如何美丽：太阳的余晖还在，天空在宝蓝浅紫浓紫之间变幻，可是，星星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出来了，一眨眼就多一个。然后萤火虫们优雅出台，明暗交替，银晖闪耀，在丛林间翩翩起舞。随后，树梢中总有隐身的动物报幕，带来了青蛙的田野大合唱：独唱对唱混声唱。这时，家家晒谷坪都事先用清凉的井水浇过，再顽皮的小朋友都会乖乖地一溜躺在木板上或竹席上。家庭纳凉晚会启动，大人们开始讲

故事。祖辈一代虽然一字不识，但神话野史却是如此这般口口相传下来，素朴的善恶评判代代流传，莫立我们民族的道德基石。

铺满星星的苍穹温柔地俯瞰着这些白天辛苦劳作的人们，抚摩着他们的眼帘，送他们入梦乡。茉莉花香弥漫四周……吴忠超弟兄们在心中刻下对家乡的最温情回忆，永世难忘。

那天，我坐在空调房的电脑旁。我的茉莉花茶再也喝不下去了。电话线的两端是一片默然。片刻之后，吴忠超继续说：但是，茉莉花茶是福州的一张名片，还是希望家乡人用好这名片。

对崇高理念的坚守，使得吴忠超深获霍金的信任。这就解释了为何霍金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由吴忠超翻译成中文。霍金信任吴忠超，认为自己的这个弟子不但在中文译著中阐述了深奥遥远的宇宙诞生的过程，而且能够传递同样的探索精神



2017年吴忠超为霍金庆祝生日

和同样的使命感。

霍金一生只收过吴忠超一个华人学生。导师去世，吴忠超尚处在悼念与悲伤之中，但他依旧腾出时间来接受采访。他希望故乡的人能够保持纯真童心，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家园的和谐与美好，在明山净水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今天，朋友圈里盛行刷“霍金”，其实，那些理论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是天书。所以，霍金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天文物理学概念，来解答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往何处去？

在霍金的最著名的科普代表作《时间简史》中，霍金选择的语言使得普罗大众能够比较轻松地接受艰涩的科学名词。而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读霍金，要感谢吴忠超。

在我的采访中，吴忠超博士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期待家乡的福州人，在介绍他时，要淡化励志描述，而更多关注他，作为一个普通福州孩子的经历。所以，我要介绍新店在福州建城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晚更新世（Late Pleistocene）是第四纪更新世的最后阶段，大约在 126000 年（ ± 5000 年）至 10000 年之前。中国东部沿海受过三次海侵。再过 5000 年左右，海侵达到高峰。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比今天的海面高出 5-6 米。那时，从北面的高山南望，福州是一片水乡泽国。茫茫大海上，屏山、于山、乌山都是漂浮的岛屿。甚至，一直到北宋之前，台江码头还在闽江浪花中。

那时，只有新店是高高在上的一块台地。根据 1996 年的新店古城考古报告，战国晚期，闽越



王无诸首次建城，冶城，是在新店，而不是历代史书上写的“屏山”一带。这就把闽越国都“冶城”向北推进了5公里，填补了大约400年的历史跨度。新店古城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炼铁炉的遗迹，证明了当时闽越国的冶炼技术已高度发达。可能这也是国都称作“冶都”的缘故。虽然这点尚有待于专家们的最终确认，但是，这推理符合逻辑。1998年吴忠超曾冒雨去参观了冶都遗址。

公元前202年，汉书载：“汉高祖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就证明了无诸此时是第二次立国。

在以后的历次建城中，冶城市建设沿着龙腰、屏山、鼓楼、南门、茶亭到台江的中轴线，一直向南，直至形成今天的福州城。

有趣的是，在无诸之前的200年左右，在遥远的古希腊出了个生性忧郁的哲学家，名叫赫拉克利得，他断言：“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果然，小忠超13岁那年，他的茉莉花田奇迹般消失了。从此，茉莉花海的童年一去不返。近半个世纪以来，那辛劳回忆在岁月的酿造中便沉淀出五味；那一片青葱雪白的芳华成了他对故园最深的眷恋。今夏，吴忠超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嘱咐我一定要去看看他的茉莉花故园。我去了，但没有回答他。他是绝顶聪明人，也不再问。大概，我们太熟悉那一句唐诗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1959年，新店建设“福建省拖拉机厂”，吴



福建省拖拉机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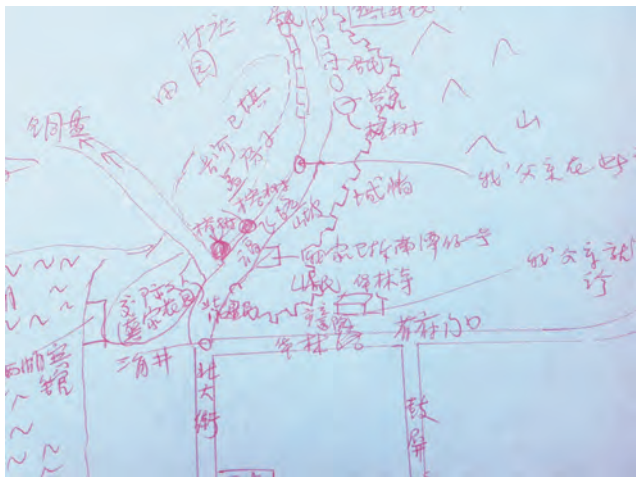
家祖屋被划入拖拉机厂的宿舍区，必须搬迁。

也是在那年夏天，南华小学决定保送吴忠超到福州七中。但是，吴忠超却坚持说自己要上福州三中，不去七中。面临巨变，吴忠超的双亲果断做出了最正确的决策：向南迁移，到龙腰村落户。吴爸爸是个兢兢业业的乡村小学教师，长年不在家，家中4个孩子和祖母全靠母亲抚养。这位了不起的吴妈妈，虽然目不识丁，却英明果断。

如此这般，吴家便浩浩荡荡地穿过北门进城来了。妈妈肩挑家当和最小的儿子，小哥哥们赤脚啪嗒啪嗒响着，踏在旧旧的条石板路上，牵着祖母，开开心心肩扛手提，搬进了屏山西麓的龙腰村南潭仔1号。

那时，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还是模模糊糊，哪里知道父母的苦心积虑？父母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用好这一笔极其有限的搬迁补偿金，为孩子们开拓日后的辉煌人生。

他们，更加不知道的是：自己正沿着福州发



展的中轴线进城来了；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开人生重要的一步。

今天，屏山西麓的龙腰村南潭仔 1 号已经消失。原址在福飞南路 43 号，变电站的位置，在小山坡上。这里原来还有个护脉巨碑，提醒大家要保护“龙脉”。那口闻名遐迩的苔泉古井离吴家只有 300 多米的距离，坐南朝北，等待着与他们邂逅。

史书载，从石壁上流出的泉水甘甜，如龙舌，故亦称龙舌泉。自古被认为是福建品茶第一泉。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在任福州转运使时，常来取水泡茶。“龙舌品泉”曾与“样楼望海”一起被清末学者何振岱列入“新西湖八景”。

吴忠超至今对这古井水念念不忘，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说：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苔泉古井是福州最好的水——我们居然在懵懂之中，获得上天如此恩泽！谈得兴起，他特地在美国时间凌晨4点钟，为我手绘了一张古井位置图发来。

为了吴忠超的这份感恩心思，我冒雨找到苔泉古井。虽然，古井被锁了起来，但乡亲们解释说，那只是因为防止一些酒鬼深夜喝醉了酒到井里撒尿，周边的老百姓依旧可以享用苔泉古井的水。我心中顿感欣慰。

20 世纪 60 年代的龙腰也是一片安宁的原野。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的镇海楼也还是原来的蓝紫色，也还叫“样楼”。登上楼台，可以凭栏眺望闽江。那视野自然又比在新店战坂开阔，少年吴忠超开始隐隐觉得身上有长出翅膀的愿望。

西面的门前有大湖——“长河”——在史书上称“北湖”。因其南北方向的长度是东西方向的宽度的4倍，故俗名为“长河”。

北湖，原与今天西湖连通，是它的一部分，俗话说“天下西湖三十六”，第一名当然是杭州西湖，但是福州西湖名列前十之中。1915年，清末举人何振岱总撰的《西湖志》写道：“西湖传西北城外，受西北竹山之水，停蓄成湖”，“西湖秀丽，易施点缀，故即钟梵渔樵，夕阳初月，一经题咏，宛如丹青”。可以想象其景色之优美。

因此，吴家少年在龙腰村虽然依旧粗茶淡饭，但方圆百亩的北湖如瀚海，碧波粼粼，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湖畔遍布的田园提供新鲜的蔬菜。而遍地野生无主的果树——桃、阳桃、石榴、梨、葡萄和柑橘，依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开花结果成熟，笑咪咪地邀请孩子们。吴家兄弟们最难忘的是那几棵白枣树，秋风起时，在地上就

可以捡到无数熟透的甜枣。他们还可以打水漂，在湖里游泳，摸田螺或“土鸡”。

他们玩够了，回家在昏暗煤油灯下做作业，奇怪的是，班上基本上没有孩子近视。

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总结，龙腰村的苔泉古井和北湖给他们提供了真正“有机”的青少年时代。

研究宇宙和黑洞，是一群寂寞与孤独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必须十分强大，才能抵御外界的诱惑，而专注于科学探索。福州家乡如此这般美好的山水，确实在不知不觉中抚育了他。所以，对于龙腰村古井和果树，他无比感恩。

我想，这就是家乡的意义，我们从这里出发，跋涉千山万水之后，回过头来看故园，虽然已经物是人非了，但是，我们寻访的何止只是地理名字？我们寻访的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一切。

我们寻访的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老师亲戚同学朋友和邻居；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时空里，他们的身影镌刻在街角在花旁在树下，它们的气味飘荡在空气里，溶解在波涛里，冥冥中陪伴着我们。

想到此，我觉得自己的执着没有白费：到

新店到龙腰到苔泉古井，又沿着北大路一路走到福州三中，来体验少年吴忠超和今天吴忠超的心绪——他对故园的那一份牵挂。

是故园的山水赋予他追求宇宙真理和美的志向。在艰难的环境中，在许多前辈，尤其是福州三中的池伯鼎、郑瑞珠等老师的提携下，他得以进入中国最具探索精神的中国科技大学深造，继而，幸运地进入剑桥大学，成为霍金的学生，而且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2018年，霍金的私人葬礼上，他是霍金家属邀请参加的唯一华人。

因此，故园故土在吴忠超心中的那沉甸甸的分量，是任何语言不足以表达的。

他寄语故乡人：请照顾好自家的山水。

正如霍金所说：“如果这个宇宙不是你所爱的人的家园，那它就不是你的宇宙。”



苔泉古井

松 绑

马星辉

题记：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 55 位厂长经理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此举曾在大江南北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至今仍让世人津津乐道，因为，这封“松绑”信吹响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

1984 年的春天，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来自全省各地的 55 名国企的厂长、经理参加为期三天的“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地点在福州二化招待所，并邀请了省经委领导参会指导。

会议原本是按部就班，围绕着所定议题讨论

如何当好厂长，搞活企业经营。然而，就在 3 月 22 日第一次会议上，当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发言时，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他说：“在福日公司，我作为总经理拥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能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产品，从而产生可观的效益……”

游廷岩的这些话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根导火索点燃了 55 个炸药包，当即引起与会者们的强烈反应。

大家一肚子苦水倾泻而出，当场有人拍案



1984 年 3 月 23 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4年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留影

而起：“要是政府能放松国企厂长经理的手脚，我们能有自主权，甩开膀子干，也可以把企业做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一点也不会比外资企业差。”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初期阶段，正是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尤其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然而，作为企业当家人的厂长、经理却对企业的财务、经营没有自主权。计划统一下达、物资统一分配、产品统一调拨、财政统一收支、价格统一规定、认识统一安排、工资统一标准。这七个“统一”，完全把企业厂长、经理给统死了。说白了，厂长经理等于企业的车间主任，根本无权决定企业用人和奖金分配等。按指令生产的产品与

市场需要不相符，造成大量积压，厂长经理们明知有错当纠，却又无可奈何，一切需要听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安排运转。这种状况造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政府的大锅饭，政企不分、权责不分。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厂长、经理们的手脚。对此，厂长经理们空有一番报国志，却有力使不上，真是拔剑四顾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福州机床厂厂长董福森在会上带头发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企业的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而用好人才又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想把一个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培养，但我根本无权任命。”

福州二化厂厂长汪建华一针见血，毫不客气

地道：“国企‘婆婆’太多，而且一个比一个管得严厉。我作为一名厂长，说实话对工厂的发展无能为力。比如企业要技改，但得找上面层层审批，哪怕是盖间厕所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也是研究很久还解决不了，而发展契机往往就这样错过了。”

邵武丝绸厂厂长翁亨进亦举例道：“的确如此，在去年的‘广交会’上，我们厂和外商签了合同，但并不算数，项目必须等上面主管批准才行，人家耗不起时间、等不了答复走人，最后黄花菜都凉了。”

……

与会的厂长经理们争先恐后发言，矛头纷纷指向种种弊端。在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中，会议偏离了主题，变成了一场充满激情的“诉苦大会”。

参会的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黄文麟始终神情严肃、沉默不语，在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他对企业掌门人的无权之苦深表同情，赞赏他们对改革的渴求与心愿。确实，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捆住了手脚，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黄文麟的身份虽然代表着政府部门，但他觉得自己应当换位思考、实事求是，应当责无旁贷地帮助他们。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他腾地立身而起，提出建议：“你们55位厂长、经理们可否联名向省

领导上书？”

他话音刚落，在瞬间的寂静后，会场立时一片沸腾起来，众人纷纷表示赞同。经过商议后，认为这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如若打个报告，按一般渠道、一般方式逐级上报省委书记，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是没有回音，石沉大海。要改革，就先从报告的方式上改起，采取超常规的举措，越级报告，直接上书省委书记项南同志。

当下，激情燃烧的厂长经理们恭请黄文麟出面，将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主笔起草了《请给我们放权》的呼吁信。次日上午，在第二次会议上对呼吁信进行讨论修正，得到与会者全体一致通过。这封信提出企业要五个方面的权力：

一是领导班子的选人用人权。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要干预。

二是干部制度的改革权。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

三是奖励基金的主要分配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奖金随着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

四是指令计划外的生产经营决定权。在完成

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付出”。

五是领导体制的改革权。改革企业领导制，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力等。

55名厂长、经理全都郑重地在呼吁信上签了名字，为了表明改革的决心，厂长经理们在呼吁信结尾时言道：“我们要这些权力，绝不是为了以权谋私，今后如果有人滥用权力、牟取私利，搞违法乱纪，当受党纪、政纪直至国法惩处。”

黄文麟当天就把这封信送到了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信送出后，人们忐忑不安，包括黄文麟在内的省经委领导，不知结果如何，命运如何。不可否认，这封信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有些人看来，这55名厂长经理之举有些缺乏理智与沉稳，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

庆幸与欣喜的是，很快得到了省委书记项南秘书的回话，他说项南书记不仅认真阅看了此信，而且作了重要批示。秘书在电话中放缓语速，一字一句地传达省委书记的话：“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项南秘书还告诉大家：“呼吁信已交给福建日报社，将会很快见诸报端。”

当年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一事，如若没有省委书记项南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在省党报上发出这石破天惊的“松绑放

权”之呐喊，亦没有紧接着顷刻间席卷全国国企改革之风，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范例。

明者远见于未萌。在此之前，一直为企业改革操心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早已经过深入调研，了解当时僵化的经济体制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多大的阻力：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步履蹒跚、难以前行。项南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家们反映的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体制问题。这55名厂长经理的呼吁信，何尝不是一个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企业突破旧体制束缚的契机？

项南深思熟虑后，果断决定：在他主政的福建省打一场能冲破旧体制、有影响、在神州大地产生轰动的战斗，来一场集聚企业紧迫需要、领导强力支持、媒体全面配合的“松绑放权”大变革。

于是，项南不仅在信上作了批示，而且亲自撰写导语，连在《福建日报》上的刊发时间、版面、位置这些细节，也都在批示中作了指示。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给我们“松绑”》为题，在头版头条全文公布呼吁信，并配发了编辑部导语。

《福建日报》准确无误地发出了福建省委决策层鼓励“放权”的信息，发出了企业改革的重大信号。这立即得到了省级部门敏锐的快速反应：

省经委提出十项措施，包括鼓励直接出口产品、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等；

省财政厅提出，同意企业奖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顶、不保底，内部实行浮动工资；

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业中层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打破干部终身制；

省劳动局提出，企业可根据劳动计划公开考核招工，企业有权选定工资形式，明确规定给企业扩大自主权；

省政府则接连下发了7个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很快就出台了10多项给企业“松绑放权”的政策。

贤士言：“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福建的“松绑放权”之战，精心策划、政策有力、措施到位，给企业注入了生机活力。后来事实证明：“松绑放权”之后，企业经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

“立竿见影”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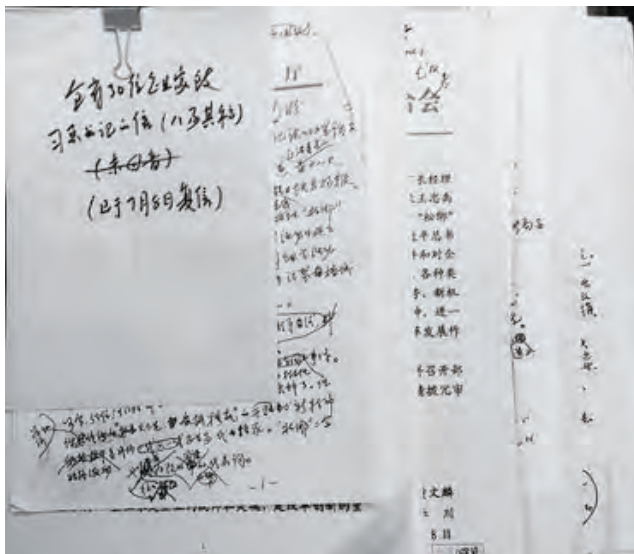
不久，《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不仅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补充了福建有关部门重视呼吁的内容。同时，配发了权威性的“编者按”，对福建省的做法表示赞赏。很快，全国各地的主流报纸也纷纷在重要版面，连续刊发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后续报道，“松绑放权”成了当时国内推动国企改革影响最大的事件。

中央高层亦对福建“松绑放权”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实际行动的支持：国家体改委邀请黄文麟与游廷岩、刘维灿等5人专程赴京汇报；中央党校约请他们座谈，探讨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仅肯定了“松绑放权”的初衷，而且制定了给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政策。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为此欢呼不已，向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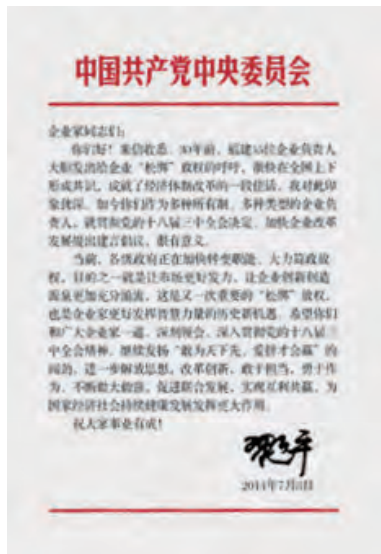


国内主要媒体对此次大会的报道





福建省 30 位企业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的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建 55 名敢为天下先的勇者致礼。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评价道：“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权力，这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人们承认：由福建发端，继而在全国推而广之的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它在全面推进城市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作用。

古人曰：“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福建当年改革之勇为，为世人高度认可与推崇。为此，十年之后的1994年1月，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协会联名向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提出申请，要求设立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从此，“企业家活动日”成了一年年度的企业家聚首盛会。30多年来，“企业家活动日”在越来越多的

城市举办，而第十届、第二十届这些“逢十”的纪念日都选择回到福州举办，由此可见，人们对福建 55 位厂长、经理敢为天下先，勇于破茧的勇气表示出深深的敬意，“松绑”折射出了福建人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拼就会赢的典型性格。

2014年5月18日，福建省30位企业家在福州聚会，纪念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周年，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抒发了福建企业家们的追梦情怀。

习总书记在回信中赞扬道：“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如今你们作为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提出建言倡议，很有意义。”

尚干七里 青春如炬

景 艳

在闽侯、福清、永泰三县交界处，福建闽侯七里（今尚干、青口、祥谦一带）西南面，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南阳顶。一片万余亩的开阔地，是南阳顶农场所在地，也是未来的生态农业基地、闽侯五虎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阳景区的组成部分。沿着山路走上几公里，便能看到一幢两层高共36间的连排青砖楼兀立在山前绿树管芒之间。那布满青苔的墙体，那被砖石封堵了一半的窗户，那窑洞般半拱门檐上的红五星，那看不清字迹却依旧醒目的白灰标语印迹，都给了这座房子以历史年代的想象。很多登山野营的人都把它当作必经的歇脚之地，却不知道，这里，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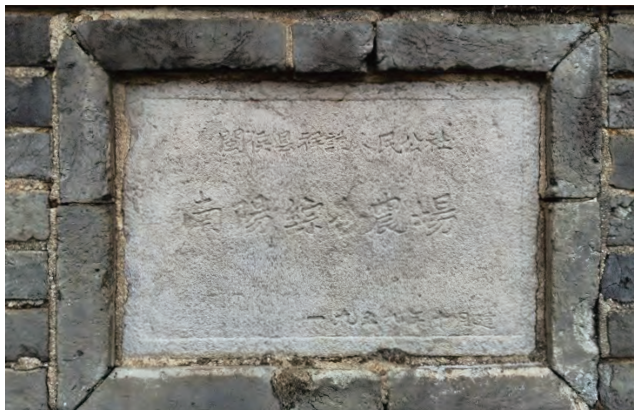
一个全国有名的知青点，一代人赤红如火的青春曾在这里燃烧绽放，正如山中那一望无际的管芒草，随遇而安又执着坚定。

—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饥荒严重，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而城市知识青年邢燕子却逆势而为，成为全国自愿到农村“大办农业”的典型。在她的影响下，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1962年9月，闽侯



南阳顶知青点旧址大门



知青点旧址大门上刻有“南阳综合农场”字样

二中7男3女10名高中毕业生也打起了背包走上南阳顶，在队长林俊宪的带动下，以场为家，艰苦创业，拉开了闽侯县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序幕。

昔日的南阳顶可以说是石头多、葛藤多、管茅多、灌木多，荆棘遍布。但是知青们在农场老书记陈依朋的带领下，和农场职工们一道，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开荒创业。“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单纯，只想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自力更生，不在城里吃闲饭，靠自己的双手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现年75岁的林瑞金是第一批上南阳顶的3位女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她告诉我，那时在南阳顶上，种稻种茶种竹种杉树种菜种豆种地瓜，什么活都干，女知青也和男知青一样，跪在水田里耘草：“山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盐巴等生活用品是从山下挑上来。我们都是学生出身，一开始真挑不了什么东西，可是，当时什么都得挑，山路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挑着沉重的担子下坡，腿都发抖，必须要用‘突耒’（福州方言）撑着。”

恰是长身体的年纪，每天又干着重体力活，吃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当时知青不拿工资记工



南阳顶驼峰

分，女的最高记8分，相当于1角2分钱。每顿一罐蒸饭，就是按16两一斤制的5两3钱，最经常的配菜就是自己种的佛手瓜。山上有野猪有蛇有竹鼠，还有山鸡、野兔，男知青便跟着当地的老乡一起去打猎，算是打牙祭。南阳顶高不过千米，晚上却非常冷，一年四季都需要上盖被子下铺稻草。没有澡堂，山泉冰凉，女知青冬天自己烧水拎到宿舍里擦一擦，夏天，一个个被小黑虫叮得红肿溃烂，也只能用酒精碘酒涂一涂。

秋天的南阳顶，管芒花开，遍山盈野，随风而舞，是那萧索微寒中最美的风景。然而，在知青曼妙的芳华中，却少了共鸣的情愫：“那芒草开花的时候，白茫茫的一片，我们都叫它们‘管硬芒’，叶片很锋利，割得很费劲，手都划得一道

一道的。不过，夏天可以做扫把，老乡家的孩子卖了就可以交学费了。有一年大雪，草茎被白皑皑的厚雪覆盖了五六天，牛羊都要断炊了。7名知青是打散积雪，冒着被割伤的危险钻到管芒丛中，割回草料以解燃眉之急。”感觉到自己的话终结了我关于浪漫的想象与好奇心，林瑞金仿佛有点不忍心：“冬天，南阳顶下雪，一切都是白的，那云雾就那么飘在半山上，很漂亮。”

“条件那么艰苦，你有下山的想法吗？”“哪有？我们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叫我们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林瑞金有好多次下山的机会，因为参加社教和三县建设，她三上三下南阳顶，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一次调动申请：“那段知青的日子虽然苦了点，却是非常快乐的，大家一起出工收工，非常充实，国家也给了我们很多。”

那些年里，南阳顶知青点就像一面旗帜，在福建省乃至全国的青少年中猎猎飘扬。《福建日报》《福建画报》《人民画报》相继刊登了他们的照片、事迹，热情讴歌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福建省歌舞团把他们的事迹编写成歌舞节目搬上舞台，闽侯县闽剧团推出同名现代闽剧《虎山行》，他们的事迹载入了《中学生》杂志。林俊宪、林瑞金等一批先进劳模代表先后出席了全省“群英会”“人代会”和“妇代会”，巡回演讲、辅导传授，获得了很高的政治荣誉。他们中的很多人转了干，获得了重新深造的机会——南阳顶上的历练成为工作的宝贵财富。

从手不能缚肩不能扛的学生仔到犁田、耙

地、嫁接、剪枝、制茶样样精通的行家，几年时间里，知青们可谓脱胎换骨。他们依靠知识的力量，改良土壤、引进良种，把单季稻变成双季稻，为南阳顶农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截至1970年，南阳顶造林达10000亩，竹5000亩，棕1000亩，果树1000亩，水稻田150亩，地瓜400亩，茶园700亩，耕牛270头，生猪100头。原先“一片梯田七八亩，大人一个不够担”的出名的“瘦田南阳山，”在1965年就变成了每亩产量830斤的“黄金田”。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感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写下了情真意切的信，要求加入这一光荣的行列。到1965年，落户农场的知青达到了108人。

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福建前后跨度近20年。1964年开始，每年都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只是规模较小，以农场模式为主。但1968年，连续三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之后，插队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布最新指示，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毗邻省城福州的闽侯县城，一时间成为省内知青争相要求前往的优选之地。全县10年间建了223个知青点，建造下乡知青住房242座，安置人数达到12000多。1974年，国家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

“紧缩”政策，要严格控制职工总数增长，知青插队出现最后一次高潮。五虎山下祥谦公社的三溪口、琯前知青点应势而生。

当时的三溪口知青点的队长林坚飞是经历了1967年“复课闹革命”之后，重返闽侯二中读高中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就是一位响当当的领袖式人物，三溪口知青点成立之后，他把红旗又扛到了知青点。“那时候，学校不叫几年几班，而叫几连几排，到知青点就成立了‘钢铁支队’，为了表达自己扎根农村的坚定决心，大家刚到知青点就改了名字，队长叫铁耕，副队长叫永耕，女的则改名永青，虽然第一批就8个人，但知青点却在林坚飞的带领下搞得红红火火。”林明秋，1977年进入三溪口知青点，是林坚飞闽侯二中的学弟，他就是被学长的模范事迹、知青点迸发的活力、燃烧的激情所打动的：“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按政策规定我可以不去，但我觉得上山下乡更能锻炼自己，还没离开学校我就把户口迁过去了，我喜欢和先进的集体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就抱这种心态。”

“我上山下乡时，老师送我两样礼物，一是斗笠，二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说是斗笠用来保护头脑，毛选用来武装头脑。我们到了三溪口，每天早晨起来还要一起学毛选呢。当时社会上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林明秋多少有些自得地说，三溪口的知青点有特色，起点高，人心齐，勤劳又正规，很多吃不了苦的人想

进都进不了。“一年365天，大家有360天都在干农活，除了生病，没有人请假，连下雨天都有下雨天的活。春节，大家都不回家，都在知青点一起过。”

现在说起“掏粪蛆”，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看着字面都有种想吐的感觉，但在当年的三溪口，却是每位知青的“必修课”。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知道，农村厕所粪坑里滋生的蛆是鸭子催肥的营养品，为了自己养的200多只鸭子，知青点里每一个人都要轮流到各个村庄的粪坑里掏粪蛆。“农村里的粪坑比较深，一个坑里的蛆量也不多，所以掏粪蛆的人出去一天，要这里捞一点，那里捞一点，走的地方越多掏得越多。看着那分量，大家就知道谁偷了懒，偷懒的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作为一个城镇长大的年轻人，扛着捞勺，挑着尿桶，从一个粪坑到另一个粪坑，是需要勇气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掏粪蛆，他最终找到了自小送人的亲哥哥，这项“又脏又臭又难为情的苦差”终究成为他笔下“既能劳动又可寻亲的两全其美”。

1977年冬天，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国家由此重新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林明秋报名参加了高考，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了喜欢的专业。他知道，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一代人的青春年华自此有了另一个奔流的方向：“上学的上学，招工的招工，当老师的当老师，选拔当干部的当干部，三溪口走出来的知青们最终都有了新的去处。”1981年，

闽侯地区管辖的 10 个县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宣告结束。

三

山上的管芒花开了一季又一季，周遭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是那一处处曾经辉煌热烈的知青点风华不再。半个多世纪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昔日声名赫赫的南阳顶、三溪口知青点在今日省市知青文体交流协会中已经低调到鲜为人知。事实上，像南阳顶知青遗址这样保存得相对完好的知青点旧址已经很少了，在一波一波的建设改造发展的浪潮中，“知青”“上山下乡”“插队”

这些名词就如那一块块建筑砖石，从记忆的残壁中被慢慢剥离。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但是，令我惊奇的是，那些经历过那一切的知青们，却说那是自己人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并不后悔。那些吃过的苦，那些流过的泪，最终都化作了富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习仲勋同志说的：“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经历过风雨沧桑，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生活上更加自立自强；学习上，更加珍惜、重视下一代的文化教育。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意义，实现了知识青年的



大山中的南阳顶知青点

精神升华。林明秋借用了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段唱词：“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有了这段知青生活，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尚干七里名人多，古有户部尚书干办林津龙、两平盐政林应雷，近代以来就有全国闻名的“二七”工运烈士林祥谦，著名政治家、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有原新加坡总统王鼎昌的夫人林秀梅、林氏陆海军四将军……当年的知青典范林俊宪后来担任了福州市马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昔日钢铁支队的队长林坚飞曾出任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

五虎山，作为闽侯县的一个标志性的山脉，开发建设它，一直是尚干七里乡民们的夙愿。

2012年1月，福州市三环路全线贯通，五虎山被纳入了城市生活区，成为福州市的南大门；2014年5月，福州市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设立五虎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倒计时；同年7月，五虎山国家森林公园获批建设。据原国家林业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原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介绍，五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期限为15年，分3期。第一期从2016到2020年，规划投资10亿元人民币。整个五虎山的建设，一是突出生态，二是突出文化。“五虎山文化底蕴深厚，有地质文化、朱熹文化、寺院文化、红色文化，还有知青文化等。之所以要把知青文化单独列出来，因为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产物，特殊的社会现象，影响了几代人。未来将以‘文革’前建设的南阳顶知青点

和‘文革’后的三溪口知青点为基地，在文化挖掘拓展方面做些工作。一个公园一定要有文化，除了森林体验、感受之外，还应该承接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是这个年代的人，感受到知青的峥嵘岁月，也看到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看到他们历经磨难，最终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从地方到中央，甚至高层核心，都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书写的一页。我们应该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的得与失，这一事件值得一代代人在总结、反思与回味中汲取力量。”

历史如烟云般逝去，历史也如金石镌刻般长存。尚干七里的知青点，不过是遍布全国的知青点的小小缩影，却同样浓缩着那一代人的绝代风华。我让林明秋以老知青的身份对今天的年轻人说几句话，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段苦难史，也是一段发展史，它在知青中间留下的敢于向大自然挑战，克服一切困难的底气和豪气就是社会前行的动力。“知青现象对国家来说是磨难，对个人来说是磨炼，那一代年轻人最懂得担当，他们把自己的使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吃过最大的苦，做过最大的牺牲，这就是共和国需要的一种精神，并非知青所独有，却集中体现在了知青身上，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尤其要注意保持这种精神。”

50多年的岁月流转，风雨变迁，昔日如织的知青点不复当年，但那燃烧的青春早已化作泥土化作芒草，成为这大地的滋养、大厦的基石。

初心不改，痴心不悔，青春如炬。

一则迟到了六十年的讣闻

闽 文

2018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做了一件看似与新闻报道很不符合的事：在其讣告栏目刊发了一则60年前的旧讣闻。

这则讣闻本应在63年前刊发，林徽因女士在1955年4月1日就已过世。

对于这么做的原因，《纽约时报》解释称，是因为自1851年创刊以来，该报的讣闻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为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自2018年3月起，该报每周四在官网推出“被遗漏的”（Overlooked）栏目，讲述一些已故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给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因为她们的去世此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这期的旧讣闻的主角是中国著名建筑家和作家林徽因。讣闻以“林徽因与梁思成：探索、挽救中国古建筑的伴侣”为题，介绍了她的一生以及与丈夫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方面的贡献。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五四运动的“点火

The New York Times

Overlooked No More: Lin Huiyin and Liang Sicheng, Chronicle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1930s, the couple began surveying and recording the country's overlooked ancient buildings, in an effort to begin preserving them.



《纽约时报》“被遗漏的”栏目补登的林徽因讣告

人”。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末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林徽因、梁思成都来自于名门望族，都曾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后来都成为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

林梁两家是世交，林徽因、梁思成于1924年一起前往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读书。林徽因对建筑学很感兴趣，但宾大的建筑学院没有接收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让年轻的女士与年轻的男子一起工作到深夜不合适。所以，他们1927年毕业时，林徽因拿到的是美术学士学位，她也上过建筑学的课；梁思成则成为正式的建筑师，他先是获得了建筑学士学位，后来又获得了硕士学位。但他们总是一起工作。

“我认为，他们把彼此视为伙伴，不是商业伙伴，而是人生伴侣。”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教授夏南希 (Nancy S. Steinhardt) 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夏南希研究过他们的工作，“分不清他们的绘图或文章中哪部分是谁做的；他们是一个团队。”

以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闻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林璠 (Maya Lin) 是林徽因的侄女，她在2017年告诉《史密森尼》杂志 (Smithsonian Magazine)：“比起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的个性和爱情经历了解得更多。”

“但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重要，”她说道，“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这么多中国古代建筑样式的记录，它们就不复存在



林徽因在测量佛光寺石幢的高度

了。”

当时，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这么容易。他们想挽救的建筑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建筑通常年久失修，而且散布在遥远的地方。许多时候，他们必须穿越中国农村的险恶环境，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远离市镇的地区考察意味着要靠骡子、人力车或徒步在很糟糕的泥

泞路上前行。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这并非易事：梁思成年轻时的一场摩托车事故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他们住的客栈通常很脏，到处是虱子，食物可能不干净，而且总有遭受造反农民、士兵和土匪暴力的危险。

两人最大的收获来自 1937 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 857 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现在，佛光寺是已知第四古老的中国建筑）。

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寺里最令人生畏、被人遗忘的地方，包括钻到寺庙的屋檐底下，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到处都是尘土，充斥着死蝙蝠。梁思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该书是与他们通信的好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用英文写的二人人生故事。

“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梁思成后来前往耶鲁大学（Yale）担任客座教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授，并成为 1949 年设计曼哈顿的联合国大楼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林徽因由于要照顾家人，又患病在身，留在了中国。1955 年 4 月 1 日，她因肺结核去世，享年 51 岁。

梁思成因为要照顾林徽因，回国后定居北京。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再婚，并于 1972 年 1 月 9 日去世，享年 70 岁。

在费慰梅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帮助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得以继续。梁思成去世几十年后，费慰梅和林洙把他丢失的绘图和照片找了回来。费慰梅把这些图片与他的文字结合起来，于 1984 年出版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一书（中译本出版于 2011 年——译注）。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做了深入的研究，记录了许多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

《纽约时报》“被遗漏的”栏目推出以来，已补登了 8 则女性的讣闻，除了林徽因外，华人熟悉的，还包括秋瑾等女性。

一炉香·生命的引渡

简福海

刚刚与春天分手的榕树，一门心思爱着江南的初夏，满树都是绿苍苍的山盟海誓。

林长民拎着铜制的香炉，路过一蓬又一蓬榕影，走向朱紫坊的麻王庙。这是1911年5月福州城的某个片断，也许是鸟声滴翠的清晨，也许是夕烟唱晚的黄昏。

林长民正为7岁的女儿林徽因还愿。前一年，林徽因出水痘，他曾来到这座千年古庙为女儿祈福。那年月，水痘凶险，医术无招，人间的寄望，多转至云端。林长民跪在南宋良医得道成仙的麻王爷面前，燃几炷香，轻轻的诵念在烛火的跳跃中结成绚丽灯花。烟雾袅袅中，总有一些东西升腾或落下，一半是引渡，一半是结缘。

对于此事，林徽因大抵是未知的。因为，在她的回忆中并无相关叙述，仅提及自己6岁得过水痘，家乡唤作“水珠”。“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此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出，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

这倒也符合逻辑。当时的林徽因寓居杭州，父亲则远在福州办学。群山意味着阻拦，江河象征着屏障，所有的牵挂担忧在山迢水远间，无法完成及时的传递。再往后，林长民或许觉得烧个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合影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及女儿与母亲何雪媛合影

香拜个神的举手之劳不足挂齿，抑或认为女儿病愈未必归功于神助，失去了对神祇的崇拜，也不太理会命运的暗示，从意外中逼迫出来的行动举止，终究被生活悄然覆盖，竟至遗忘。

然而，香炉没有遗忘。底部“辛亥蒲月林长民立”的字样，未被层层香灰掩埋。这也是我们穿过 100 多个夏天截获的密码——父亲对女儿明亮温暖的爱，一如夏日溅跳的阳光。

相较于父亲的舐犊情深，林徽因对母亲何雪媛则是爱怨交织。何雪媛在家中排行最小，性情骄纵，又不算漂亮、不通文墨、不工女红、不显练达、不会持家、不擅处事，最重要的是没能生养继承香火的儿子。如此“一无是处”的女人，必然要被边缘化的。待 10 年之后林长民再娶，她便被撵到了后院。

后院锁着的凄清，林徽因刻骨铭心。偌大的房子，住着橱柜，住着衣裳，住着杯盘碗盏，也

住着蚊蝇，住着风雨，住着四时不变的寒凉——说到底，是居住着一个愁云满面的女人。院中的柏树，委顿、阴冷，映衬着母亲落寞的背影。生性活泼的林徽因每次回到后院，那份苦闷压抑只有枕上泪知道，它们都化成一堆破碎、潮湿且哀伤的问号。她不明白，后院为什么是空心的海绵，一到家，就把自己的快乐一干二净地吸走。

都说痛感是记忆的标签，可是，林徽因很少借由回忆的长篙，向童年漫溯，更不曾以文字去挂幡招安——或许，内心残旧的隐痛，早已淡远成一抹若有若无的山痕。然而，隔着十八里路回望，与母亲血脉贯通的梁从诫却颇为感伤：“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当然，岁月带给一个人残碎世界的同时，也

通常会磨砺出坚固的心桥，通向每一个绯红的黎明——这是另一种引渡。林徽因以木秀于林、高出于岸的表现，获取了更多的关注，平衡着母亲的失落。6岁便为家人代笔书信，寄给在外打拼的父亲。十三四岁时，父亲曾来信夸赞林徽因：“我不在家，汝能为我照应一切，我甚喜……”林徽因在信上旁批：“民国七年爹爹赴日，家人仍寓南府口织女桥，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蝇头小楷，端美宁和，言之有物，与父亲的关切瞩望遥相照应，连贯的语义、通达的心境、深彻的感悟，全然一个成人的心思和功力。她似乎不曾经历撒娇承欢的童年，便跳跃式地流进成年的深海，无师自通，却又无可奈何。

费慰梅对林徽因的童年际遇愤愤不平，“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费慰梅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女儿，家庭环境优越却性情淡泊，是林徽因唯一的闺蜜。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她们之间絮絮叨叨的交谈，未必不是林徽因精神松绑的方式之一。这样的知己，拥有一个已足够。

时光在冷热交替中一笑而过。再往后，祖父去世，同父异母的弟妹尚小，父亲依然为政局大事奔波在外，一家老小的居所在北京、天津等地多次迁移。当生命的颓丧与生活琐碎的细枝末节，那样真实具体地摆在眼前，怎容她逃避？照顾母亲和二娘，照看弟妹，打点搬家行装，联系运载车辆……每一样都要拿主意、见行动，林徽

因渐成家里的主心骨，以瘦弱之躯扛起玄黄未定的乱世里飘飘摇摇的家。

前进，拐弯，一天的结束与另一天的开始，似乎只有一瞬。大约到了中学毕业，林徽因的人生像是从嶙峋的山岗，纵身跃下一道缓坡，离平原更加接近。又像是一株桃树，春风来了，她就满树虹霓。

仿佛，世界欠下何雪媛的才华与厚爱，开始加倍偿还林徽因。

1920年的阳春三月，二八年华的林徽因随同父亲游历欧洲。父女俩拖着行李箱启程南下，在北京的站台与胡适、张慰慈等依依惜别，4天之后徙达上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轮，开启了烟波浩渺的异国之旅。那天是4月1日，隔岸是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名流挥手相送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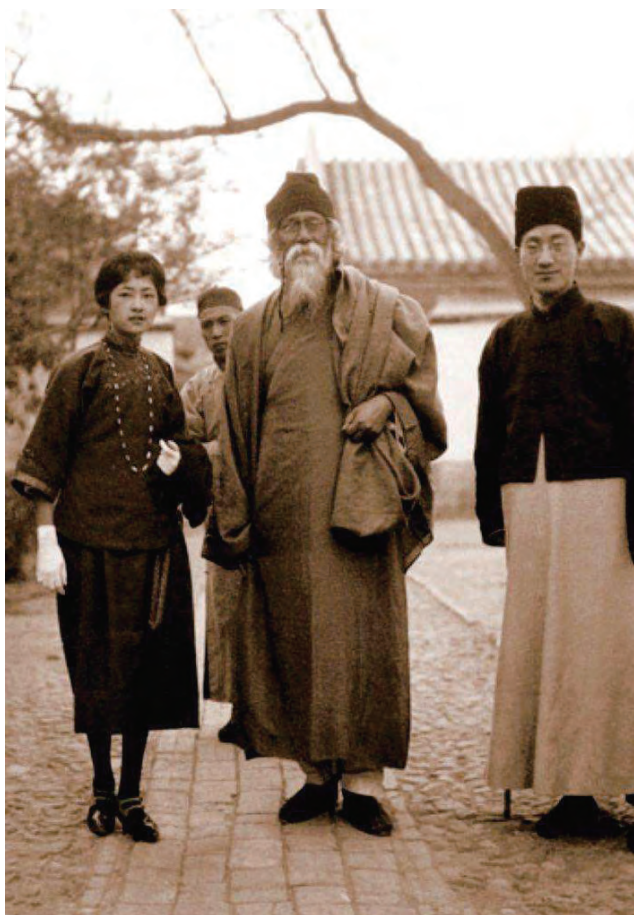
“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的林长民，对女儿随行深埋一番苦心和龟勉。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瀚海中的远眺，高天里的飞翔，终究是人生的望境。从法国到英国，再到欧洲大陆，那是一段紧凑而宽和、激越而素朴、新奇而体悟的岁月，林徽因在走走停停中开阔视野、远荡胸襟、广交益友，并且如愿以偿地找到人生的方向——献身建筑科学。一年半后，旅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林徽因告别了异国云彩，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

时光策马奔腾，转眼来到1924年的4月，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访问中国，日程满满。徐志摩、林徽因参与翻译，用了中国最美的修辞，仿佛飞瀑流泉，淙淙可听。林徽因还担纲泰翁诗剧《齐特拉》的女主角，清脆流利的英语吸粉无数。临别时，这位诗翁还若有所思地为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感情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佳偶难成的深深无奈：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1924年泰戈尔访华，林徽因和徐志摩陪同翻译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唉

她的爱情及其几个异性的名字，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梁思成的包容、徐志摩的追逐、金岳霖的守候……家世故交，美貌才华，爱恨情仇，恋人友人，鲜花荆棘，流言美誉，真实虚妄，一切了无新意，却又源源不断。想想，倒也释然。一些人和事，似乎在人们的叨念中才得以跨越时空永续流传——高论也好，微议也罢，总会给后来观察者提供打开真相的索引和逆旅。

我以为，梁林二人灵肉相契、情比金坚。他们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车祸、1924年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返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反对、大姐思顺的误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风雨彩虹、修得正果，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梁思成曾诙谐地对友人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这是场中人对共历时光的集萃提纯，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如山铁证。

度完蜜月，能操一口流利福州话的林徽因，于1928年的夏末秋初回到榕荫叠叠的故乡。她去父亲创办的私立福建法政学堂触砖抚瓦，并与二叔林天民一家合影，以此缅怀英年早逝的父亲。在仓山小巷深处那青枝霭霭的可园，与孤栖独宿的母亲何雪媛共度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有人说，这相当于闽俗传统的婚后回门。但是，一个人在蜜甜似的新婚时光，犹记得父亲的遗业、母亲的迎养，这称得上是最长情的告白，也是在外

游子与故乡胎盘的再次绾结。

此后，她与丈夫前往东北大学任教。再后来，诗歌找上了林徽因。那是1931年，她移居幽静的香山疗养，倦梦得以舒展，血肉得以丰满。她说“天知道究竟写诗是怎么一回事”，然而，炽热的信仰与爱情，许是诗歌的源头。生活的幸福、未来的美好、古建的灿烂，日月星辰、天风雨露、峰峦江海等等意向从她脑海中萦回逼真出来。在此后兴致高昂的创作中，清脆的笑声也成了诗的模样——从《笑》到《深笑》。她那时的笑是眼睛、口唇，是唇边浑圆的旋涡，是明珠，是花儿开了一朵，是雪化后那篇鹅黄，是高塔上风铃的转动……总之极其空灵。断句间舒展的欢颜、点洒的欢笑，无疑是内心镜像里鸣响不息的钟鼓之声。

除了诗人，还有一重符号是别人抢不走的——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和女建筑师。夫妻双双加盟营造学社后，深入乡野考察，朝奔夕走、风餐露宿，攀梯上梁、探骊得珠。足迹遍布十余个省份，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

春风万里，终究不负寸草心意。于是，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在人迹罕至的五台山被发现了，巍然屹立的千年雄姿，打破了日本人“这样的建筑只能到奈良城

去看”的妄言。嚟嚟开往太原的列车上，窗外是榆次静穆的大地，简约的雨花宫在模糊的车窗一闪而过，林徽因慧眼识珠，建议踏勘，考察的结论印证了她的判断，那是宋代初期的建筑。因这一发现，“雨花宫”这三个优美的汉字列入了史册，实证唐到宋的建筑风格过渡。这些片断可以看出，林徽因学问的跬积、情怀的修炼和独具的敏锐，在考证的程序里有如密钥，直达要害。

她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筑意”这一学术概念，科学而光亮，浪漫且实用。“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有历史在诉说乃至歌唱着时间的变迁……”只有诗人探向时代前沿与社会责任的笔触，才能如此这般地让顽石点头、使建筑说话。她的天分与帮助，也令丈夫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



林徽因在福州时曾住仓山马厂街可园

成了对“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

即便到了生命的晚期，她依然要发光发热。设想修建“城墙公园”，挽救景泰蓝传统工艺，倡议保护牌楼，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设计……这是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点得着火、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啊！

1955年4月1日的清晨，来不及见一面外孙的模样，她就停止了呼吸。一切与命运相关的东西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吗？4月1日，多么意味深长的日子，35年前同样的一天，她向欧洲远游出征，这次显然不同——她开启的是永无归期的远行。

就这样，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

她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直过欧美；走过信仰，走过诗意，走过苦难，走过无畏，走过荣耀，平静地走回了家。八宝山一隅，香炉腾烟，墓碑下方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雕饰试刻样品。这是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以才情为斧凿，她在最坚硬的质地上完成人生最精美的构图。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她的人生宛如一首钢笔写成的分行诗，用笔果断肯定，线条刚劲流畅，黑白对比强烈，画面丰繁紧凑，每一行都伸向一个领域，都有无垠的辉煌。而半百年岁的终止，短促得也像一首诗，余韵悠悠，怀念不休……



林徽因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庐隐的月下老人

王国栋



林宰平先生

1929年春季，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休学生李唯建，自上海返回清华办妥复学手续，闲时，断续浏览了两三本庐隐《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小说，颇为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便专程致信在广州的梁漱溟先生，望其寻得一位熟悉庐隐的老乡，帮他介绍庐隐认识。不久，梁先生即有函复，介绍他认识北大中国哲学教授林宰平先生。李唯建记起同乡老友沈从文初上北京时节，生活无着，就是被这位林教授发现介绍去香山慈幼院

图书馆，当个固定的办事员；嗣后这位“积学聚德”的林教授，还把沈从文举荐给徐志摩。

1929年3月2日，星期六下午，李唯建找到林宰平先生寓所，递上梁漱溟先生信函，见到桌上正放着一本《华严月刊》。林宰平先生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小说家庐隐编辑的，另一位编辑是新诗人。李唯建说，这位新月社诗人于赓虞，在诗社早就有点交情的；那位小说家庐隐，我很愿意结识，求林先生介绍！林先生道，自己和庐隐是同乡，也曾谈过几次话，一次是年假在福州她任教的女校相遇，还有一回就是李大钊先生遇害当日，庐隐到刑场收尸埋葬回李家后。当时庐隐忙于善后，顾不上与朋友对话。林先生说：如今要把你介绍给她，未免突兀一点。看着李唯建失望神色，老先生说，好在我有一个朋友，叫瞿世英（号菊农），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他对庐隐比我更熟，他看过庐隐此前所有作品，还为庐隐《曼丽集》写序，庐隐每周日差不多都要到他家里去。你在那里，准会遇得到她。林先生见李唯

建很是愿意，便提出具体办法：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给菊农，托他向庐隐说明，明天星期天上午大约10点钟来他家，有个清华青年诗人李唯建与庐隐见面。

林先生约好了，李唯建又感谢又高兴，“月下老人为我安排好，明天我将在博士教授家里和这位名满全国的女小说家见面了！”他春风得意地告辞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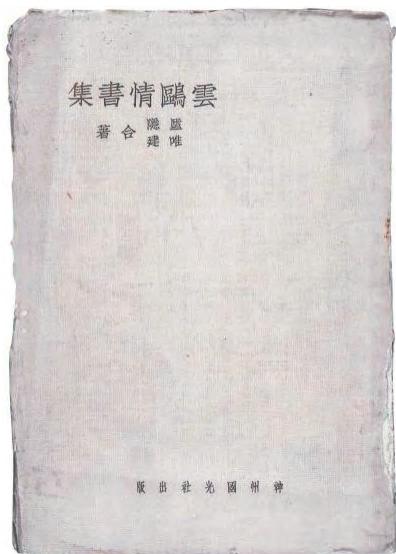
3月3日（星期天），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李唯建赶了20余里路，终于赶到城内瞿宅。这时已是11点半。一按电铃，开门的是位约30岁的很活泼的绅士迎上前握手，说，庐隐已经来很久了，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快请进！

瞿教授让李唯建在客厅等，不久便听见石阶



庐隐与李唯建

上的足音，随后出现一位身材中等、满面愁容的中年女士。主人通了姓名后，她略略点头，显出一些不豫之色。李唯建察觉出这表情皆因自己不守时刻所致。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在访谈中回顾“3月3”这场初见的庐隐：“一副严峻倔强的表情，令人望而敬畏，似乎不太容易接近的样子。隆突而长的额头，双眉的距离很宽，目光炯炯，颧骨高耸，一口流利国语。态度十分豁达，举止异常大方，显得不卑不亢。刚毅果断，敢作敢当，毫无女性那种温柔之美，却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勇敢，慷慨，量大，具反抗精神而且从不沾滞、后悔。服装朴素大方，无修饰雕琢的作风，一切顺乎自然，且不拘小节。”后来李唯建问她最近有何创作，她的回答更冷淡。不久主人因有事出去了，李又问，女士为什么这般深沉悲哀？她只说这是各人的主观，不能勉强的，此刻不便多谈。她脸上露出一异常抑郁的神情。李唯建深表同情，想无论她多么悲观，我都要从痛苦的深渊中把她救起，便颇有自信心地对她说：“女士，我从前也很悲观，后来渐觉这只是枉然，才发誓要征服命运，与世界宣战，建设一个地上的乐园。我理想是约二三知己，寻找一个幽静所在，写自己的东西，读自己爱读的书……”她忙抢着说：“你可看看我的处女作《海滨故人》，就知我少女时代的幻想如何高超远大！”她一味倔强，不以其见解为然。李唯建告诉她新近写完一首长诗《祈祷》，其中有自己的人生观，希望能赐览。她拿起毛笔，写上住址，说，以后有空，请来谈



《云鸥情书集》



《庐隐全集》，王国栋编

谈。李一看，笔迹如此健劲如此锋利，不禁佩服她的个性和勇气。

自此，李唯建对庐隐展开猛烈的追求，信心满满，他当夜便动手写起情书。但是，正如后来他们的女儿李恕先所说：“由于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等原因，他们的相恋也遭到了家庭亲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在她的生命里，已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与苦难，她实在没有勇气再向这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与抗争。然而，父亲却锲而不舍地、热烈地、诚恳地、再三地向母亲表白自己的真情。母亲心里的防线渐渐崩溃了。”于是，两人相谈默契，评诗论文，创作翻译，情书频传，整整一年，68封信件，汇成一本《云鸥情书集》。庐隐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

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

2016年春，李恕先收到笔者编的《庐隐全集》后，电话里告诉笔者，她在1988年春，拜会到病中的沈从文伯伯！那天他精神比较好，坐在轮椅上，轻松地话家常，说：“我今年86岁了，比你爸爸大5岁。他很漂亮！”李恕先说，沈老对往事有非常清晰的记忆，记得和她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谈到对沈老有着知遇之恩的徐志摩、林宰平时，眼里却闪着泪光，伯母张兆和用手帕轻轻为他抹抹泪，后来，谈到她母亲时，他笑呵呵地问：“你知道你爸你妈的月老，是林宰平吗？他和你妈妈都是福建人。”回到住处，晚饭后，李恕先便打电话去沈家，传来的竟是无情的噩耗：沈老抢救无效，刚刚走了。这一天是1988年5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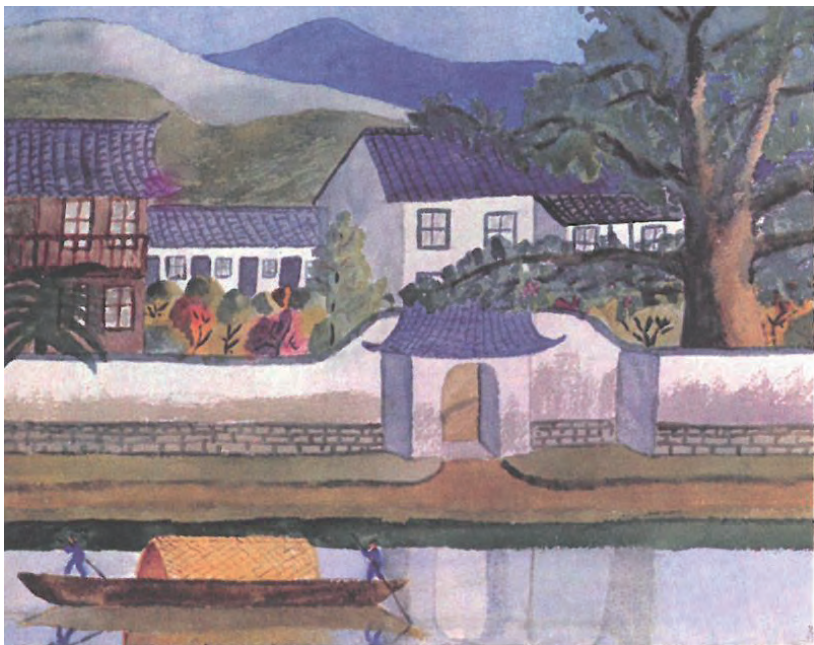
一位美国医生笔下的福州乡村旧景

许维勤

茹丝·V·海门薇 1894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农家，从小立志学医。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听到关于中国医疗状况的报告，决心把自
己的“能力和知识贡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她
本非宗教人士，但当时教会是通向中国的捷径，
于是加入美以美会，恰好当时美以美会正为年老
体衰的闽清六都医院首任院长卡尔顿物色继任
人，海门薇很快被确定为合适人选。六都医院是

福州地区创办较早的教会医院，成立于 20 世纪
初，现为闽清县第二医院。

1924 年 1 月海门薇来到中国，此后在中国
工作 18 年，其中前 12 年在六都医院任职，完全
融入当地社会。海门薇晚年愈发怀念自己在中
国的行医生涯，她整理早年日记，还用学得半生不
熟的水彩画把对中国的记忆画出来。后来其手稿
的文献价值被一位历史学教授发现，编辑成书出



海门薇所画的闽清六都医院旧貌



在修整中的闽清六都医院现状

版。海门薇日记涉及内容广泛，体察细致，文笔流畅，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景象、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其中对福州郊区和闽清乡村的描述尤其引人注目。

交通状况与慢节奏

海门薇进入福州的第一感受，是生活节奏的明显变慢。她从上

海乘坐一艘运木船来福州，傍晚进入闽江口，换乘人力小船，要等潮起才开船，第二天凌晨到达台江码头，仍然要在船上等，天亮后城门开了才能进城。当时福州马高爱医院也缺医生想留她，但她认定闽清才是她该去的地方。福州到闽清 75 英里水程，夜间登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闽清县城。如此交通效率，使过惯了快节奏生活的海门薇，感到“不知能不能习惯这种慢节奏”。

从闽清县城到坂东没有公路，走山路怕遇到土匪和老虎，所以只能选择水流湍急的梅溪，乘当地称为“鼠船”的狭长小船，用竹篙撑进。遇到急流，船夫还要下水全力推。海门薇称这是她青年时代“最惊悚的一天”。到了云龙乡潭口，有个 3 英尺高的跌水，10 来条船聚集在那儿，船



在闽江逆流而上 海门薇 / 绘

夫们分成两拨，一拨在岸上拉纤，一拨蹚进没到腋下的冰水中用力推，互相帮衬着一条一条越过瀑布。在这个过程中，船夫们快乐地互相开着玩笑，用力时则唱起号子。这个情景深深震撼了海门薇，她写道：“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好像我知道这种生活，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在美国，我们开汽车，过舒适的生活，寻求快乐，追随欲望，我觉得那反而不是真实的生活，那是人造的东西，给人以肤浅的快乐。”短短 20 多里，整整撑了 12 个小时才到达六都。慢悠悠的路程，使海门薇能够欣赏两岸优美的风光、民俗和各种农事活动，等她到达位于美丽的坂东溪畔的六都医院时，她已经“爱上了我的新家”。

初来乍到的海门薇还面临两个难关。一是寒



过马牙齿桥（石磴桥） 海门薇 / 绘

冷关，闽清的冬天阴冷而潮湿，一些人工作时只用一只手，因为另一只手要拎着一个“火笼”。另一是语言关，教会专门为她派了个老师教福州话。福州话每个音有七个声调，不同声调有不同意思，句子很简单，但同样一句话往往又有不同意思，这让海门薇学起来非常吃力。她很用功，4个月时间就学会了1000个字和600多个医学名词。

医院病人很多，来自远近不同的山村，还有来自外县的，有的由壮汉背来，有的用滑竿抬来，甚至有小脚女人走3天路来的。由于是教会医院，除了坐诊，不时还根据需要到有传教士活动的村庄去巡诊。比如她到任不久，就应三都牧师邀请，步行3里到楼下村的福音堂开诊，用一

天时间，看了四五十个病人。1925年2月，董事会给她配了匹马，这使她能够到更远的山区去看病。她多次去过四都、五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四都、十五都巡诊，最远的还跨过闽江，到对岸的安仁溪、小箬、大箬、水口等村落，足迹遍及闽清各地。1931年后，县城到坂东的公路修成，电话也通了，医院买了辆旧福特车，此后海门薇经常开车出诊，效率明显提高，巡诊范围也扩大了。

医疗卫生状况与乡民习俗

山区人们靠世代相传的习惯对付疾病，小病靠偏方和土郎中，大病则求神算命。海门薇生动地记录了许多这样的病例。如她在三都看到一个娃娃耳朵里全是泥，而他妈妈说他只有两岁不能洗澡。还有个10岁的孩子肚子痛好几天被送到医院，他妈妈说：“听说蟑螂粪有用，但找不着，于是我用老鼠粪，但是没有用。”孩子的腕被割过，据说也是为了“让肚子里的虫子流出来”。有个大爷膝盖肿痛好几年下不了田，当地和尚和算命的都治不好，决定来找洋医生试试。他对量体温、抽血、注射神奇不已，并感慨：“他们治什么都用酒啊！”

各种棘手的病被海门薇治好了，求医的人越来越多，但医院缺乏病房，设施简陋。海门薇

在老院长卡尔顿支持下，想方设法改善医疗条件，逐步建立起实验室、手术室，并进行闽清史上第一例外科手术，为一位患者切除巨大的甲状腺瘤，还成功挽救了一名因腹部溃烂肠子流出体外、被认为在医院不出3天就会死的妇女。海门薇出名了。

海门薇与教会中人显然不同，教会中人总认为传福音比医疗重要，医疗只是服务于传教，而海门薇“对转变他人的宗教信仰提不起热情”，她来中国的目的，“是想给他们治病，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发现有关他们的身体、心理、精神健康的自然规律，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育他们的儿童，使孩子们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她努力配合教会以便在教会支持下发展医疗事业。她到任数年之内，六都医院新建了楼房，用上电和自来水，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都有很大提升，病床达到100多张，还办起护士培训班。1931年通了公路后，她又推动在县城搞了个小医院，驾着那辆老福特奔波在两个医院之间，还在十四都、白云渡建立了两个乡村诊所，“每天从黎明工作到深夜。”

疾病与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密切相关，海门薇提到最多的病，有疥疮、沙眼、肠寄生虫、脓肿、溃烂、疟疾、肺结核、伤寒、肿瘤、蛀牙等，还有麻风和鼠疫，患者有农夫、船夫、挑夫、木匠、铁匠、小店主各色人等以及妇女、儿童。这使她思考贫穷、愚昧、迷信和恐惧产生的后果，因此她“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卸下人们迷信和无知的负担，这和给他们治病同样重要”。

她组织了许多科普活动，向民众宣传刷牙、打苍蝇、防蚊子的重要和抽鸦片的害处，讲解疥疮、肺结核和其他疾病成因及维生素的作用。

行医之余，海门薇对当地民间习俗“很感兴趣很着迷”。她到闽清不久，正赶上农历新年，春节、游神、闹元宵、“十八坂”集市让她目不暇接。她还在元宵节被允许访问六都一个祠堂，祠堂里摆满供品。医生的身份使她这个“洋鬼子”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她曾经参加过当地人的丧礼、婚礼、普度活动，还看到当地人在溪边烧纸船“六旬”，以及为死在异乡的人招魂等仪式。她对这些民俗活动的细节及其含义都有所了解，认为其中包含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古老智慧。她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对于西方人自视高人一等以及试图改变他人信仰，流露出一不以为然的態度。

海门薇还饶有兴趣地写到许多农事活动。她写大水轮车碓舂米、榨甘蔗；写各种季节农民如何割稻、插秧，春天山谷里嫩绿的水稻“像柔软的毯子一样”；写山民用竹子造纸、用白蜡果造蜡烛；写渔人在竹排上悠闲地用鱼鹰捉鱼。山区许多古老的技术令她惊异不已。在她眼里，闽清乡村充满生机而美丽，闽清农民勤劳而聪明。

匪患与政治

海门薇在中国混乱年代进入闽清，最让她惊恐不安的是土匪肆虐。在医院附近或路途中，

她亲耳听到夜间土匪进村传来的枪声和女人的尖叫哭喊声，在偏僻的山村目睹了被土匪烧杀抢掠过的惨状。她多次进入土匪控制区巡诊。人们善意提醒她要小心土匪抓她以勒索赎金或当压寨夫人。最大的一股土匪有1000多号人，头子叫黄宝云，十一都、十都、十二都一带是他们的地盘，医院经常有这些地方人被打伤来治疗的。有几次她甚至收到宝云匪帮送的信，要她去为土匪治病，她不想去，但担心医院因此遭到报复，最终还是去了。每次上路，她都“带着两格令的吗啡在我的衣服里，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

黄宝云是十一都潘亭村人，不到20岁就上山为匪，曾接受福建自治军招安担任排长，不久

又落草为寇，在闽清、永泰交界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甚至袭击县保卫团。1929年省城海军陆战队到闽清剿匪，黄宝云接受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县保安大队长，称霸一方。他以“筹饷自治，保境安民”为名大肆敛财，手下干将增权到三都等地派捐，竟以掳人妻女、烧人房屋的惯匪做派勒索，搞得天怒人怨。后来国民党军队需要拼凑力量攻打闽西红军，把黄宝云部收编为一个团。但这伙乌合之众对红军怕得要命，行军路上溃散大半，黄宝云走投无路自杀了。凶匪增权被抓，送到三都，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海门薇对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未必了解透彻，但她对强人亦匪亦官的恐惧和憎恨很真切，对凶匪的下场表示



军阀部队穿过闽清 海门薇 / 绘

“毫不怜悯”。

海门薇笔下的国民革命给乡村带来的风波和变化也挺有意思。

1926年底，国民革命政府北伐东路军占领福州。国民革命揭橥反帝反封建，作为外来势力，教会中人颇为紧张。福州被占领后，就传说会从县城来一群人捣毁医院，赶走外国医生。医院上下一片恐慌。美国驻福州领事馆电报要求海门薇回国。她“不明白政治形势及其对未来的意义”，但还是将信将疑地收拾行装走了。她不想离开工作，只是到马尼拉暂避，但在马尼拉得了严重的痢疾，只好回美国治疗。1928年12月她带着大量药品回到福州。

在福州她看到革命带来的一些新气象，政府通过了许多改革计划和法律如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庙宇、提倡卫生、改良农业等，清洁日还有官员上街打扫。但她回到六都后发现乡村治理并没有多少改善，土匪更加猖獗。时任省第七防区司令黄炳武回六都湖峰省亲，居然遭黄宝云袭击，狼狈逃走，

后来他带兵打回来，给黄宝云匪帮以沉重打击。

黄炳武是当时地方政治强人，一个当过县长的病人告诉海门薇，黄炳武在闽清待了40个月，从各种渠道搜刮了20万元。兵、匪的双重搜刮“使百姓一无所有”。但黄炳武在剿匪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还是起了作用，也办了不少社会事业，县城到坂东的公路和电话就是他修的。从海门薇笔下可以看出，国民革命后的乡村社会还是有一些变化。

安宁舒适的福州

六都医院蚊蝇很多，来闽清不及半年，海门薇就染上了疟疾，不断发热和肚子痛，马高爱医



闽清农民收割稻子 海门薇 / 绘

院也治不好，被安排上鼓岭疗养。于是她又留下不少描写福州市区和近郊景象的文字。出了福州狭窄的街道，“石头路的两边都是成熟了的金色的早稻田。”田野里有房子挨得很紧的小村庄，光着身子的孩子在野地里跟猪和鸡一起玩耍。上山走的是陡峭的石阶，清早出发，下午才到达。鼓岭上避暑的传教士很多，他们互相走访，一起上教堂、聚会和野餐，清新的空气使她很快康复。下山后她又在城内南街朋友家里住了几天。城内有玉器街、当铺街、工匠铺、精美的高官房子和教会社交中心，朋友陪她参观了教会的公益事业以及鼓山寺院、孔庙。她愿意平等看待中国人的信仰，认为：“在福州这样的城市，传教士们跟中国人的关系很肤浅。他们总是不断地把美国生活方式带给当地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福音。不幸的是，我认识的传教士很少有想了解中国人的观点像中国人研究我们的观点那样认真的。如果要构建联系两大民族、两大文明的友谊之桥，那这桥必须是双向的。”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见多了西方人歧视中国人之事。在上海到福州的船上，她看到传教士的孩子们对中国人很不礼貌，还公然说不愿意跟中国人住一个船舱。而在福州亲历的一件事，则直接刺痛了她。她曾在闽清墘上村按照当地习俗郑重地领养一个女婴，取名华星。有次到福州她就把女孩带上，不料到了福州才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我和华星。甚至马高爱医院也表示，欢迎我但是不要带中国婴儿。”她不得不把孩

子托付朋友照看，才能跟西方同事相处。这种歧视让她很受打击。她觉得：“所有传教士都应该接受心理分析，拔除潜伏在下意识里的种族优越感的根子，才能到中国传扬基督教。”

海门薇频繁地从闽江往返于闽清与福州之间，除了出入境必经福州，她还多次到福州疗养，或在马高爱医院替班。20世纪20年代后期，福州与闽清之间的闽江上已用上汽船，交通效率提高后，海门薇有时也专程去福州看一些棘手的病。但她在福州停留时间都不多。

与乡村的动乱相比，福州要安宁得多。在她看来这种安宁来自海军的控制。她刚来福州时，福州是暂编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的势力范围。北伐军占领福州后，福州海军被国军收编。国民政府带来一些新气象，她在福州不用担惊受怕，感觉“福州好像另一个世界”。

告 别 闽 清

不良卫生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使海门薇的健康受到影响，她的疟疾反复发作，还得了牙病，拔牙后引起破伤风。1934年12月，主教来信让她立刻回家休假。她在闽清最后一次出诊，是为一位难产的妇女接生。当时她疟疾犯得厉害，被人用滑竿抬到产妇家。产妇已临盆5天，失去知觉，面白如纸，脉搏都摸不到了，屋外的亲人们已开始唱挽歌。海门薇用产钳夹出一个漂亮的男孩，母子平安！产妇的丈夫热泪奔涌，当

场给海门薇下跪。

海门薇在闽清县城过完圣诞节就要走了，尽管并没有迹象表明她从此就脱离闽清的工作，但告别仪式还是很隆重的，他们安排了聚餐和聚会，会上海门薇还谈了对闽清未来医疗服务的梦想，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起身时，所有人都出来送她到车站，人们流下不舍的眼泪，按闽清习俗燃起送行的爆竹。

海门薇在美国休养了一年多，1936年6月又来到中国，被安排到南昌协助管理一家教会医院，她答应在那里工作一年后再回闽清。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海门薇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名参加志愿医疗服务，先后在重庆、资州等地医院工作，直到1941年再次因健康原因被召回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她梦萦魂牵的六都医院。

海门薇回美国后继续从医，但在闽清工作期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对闽清有特殊感情。她观察细腻而敏锐，在日记中多次直抒对中国人言谈举止的好感。这些好感和观点，又在晚年整理的书稿的《后记》中进行了概括。她写道：“我观察了中国人这么多年，不管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缺点，他们从许多世纪的苦难中学会了忍耐；从孔夫子学到了哲学和戒律；从佛教学到了平静安宁。他们是一个能干、自豪、勤勉、智慧和富有直觉的民族……我认得的中国人都热爱自然……他们永远是彬彬有礼，注意各种不同关系所要求的礼节……中国人说话时都注意让客人觉得自在舒服，尽力保全面子。”



《海门薇医生在中国》，茹丝·V·海门薇 / 著 张天润 / 译

这些看法，主要来自在六都医院工作期间与闽清人深入接触的感受。在闽清县城，她目睹人们迅速在一场巨大火灾的废墟上重建生活秩序，认为其中体现出中国人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她激情澎湃地写道：“我再次感到一种激情，想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巨大潜力。他们身后有着许多个世纪的高度文化、深奥的思想观念和巨大的历史成就。我欣赏他们的力量和耐性。他们顽强地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惜受苦和牺牲。我非常相信他们有能力在新的道路上成长和发展。我相信中国人最终将建设起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也许那时美国已经开始衰落。”

回望洪塘故乡

邱泰斌

那条美丽宽阔的福建母亲河闽江，自武夷山脉发源，滔滔东流，奔至有福之州古怀安石岳山分港分江，纵贯省城。而我的故乡洪塘，恰好坐落在福州城西关外、南台岛西北端，北港白龙江进城的第一水段洪江，故名。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闽江边。

山贵有脉，水贵有源，洪塘是福州八大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是一座千年锦江重镇，尤其是那里的妙峰山峦连绵神妙，闽江金山寺水古老灵秀。

少小离家老大回，近来原本一些远走高飞、天各一方的亲戚乡邻，时逢故乡三环路建设祖厝拆迁分房，欢聚故里。

人以旧为亲，情因老更慈。

回望故乡，草木葱茏；追溯旧事，呼之欲

出。

一曲唐谣动全闽

唐朝明月，福州西关，历史悠悠，名满天下。

洪塘在唐月童谣中摇曳催生。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

这是一曲福建最古老且深情缠绵的民歌情歌。

这曲唐谣，描绘倾诉的是自唐以降，江山如画、风情万种的洪塘。

民谣名动全闽，情系桑梓。

相传这曲民谣是由常袞加工润色成歌的。

常袞何许人也？据记载，常袞是大唐贤臣、教育家，原为唐代宗宰相，因直言敢谏，于建中元年（786）被贬至福建任观察使（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

史载，常袞入闽时，“闽人一字不识，难以开导，遂作俗谣《月光光》，以土音教之，歌既能唱，随写字教之识”。于是，蛮荒之处闽地风俗完全得以改变，“每年选送到朝廷的人才与内地各州一样多”。

天籁之音，千载不衰，世人称之“闽风”（犹颂国风）！

不但闽人耳熟能详，甚至在港澳台、东南亚华人中也广为流传。

由此足以佐证：我的故乡洪塘，不但是福建民谣发祥地，而且对全闽文化教育具有启蒙扫盲之功。

我曾两度走访风靡于世的福建南靖“云水谣”，两相媲美，我敢断言：自唐以降月光下的

洪塘肯定远比土楼云水谣更加古老精彩，美妙诱人，影响深远！

据载，古时候，人们来往于福州城与南台岛及周边水域之间，在尚未建起桥梁之前，靠的是乘船或“骑竹马”过渡。这里所称“骑竹马”，史上指的是乘坐似竹筏一样的水上交通工具。

洪塘一带古渡总称洪塘古渡，实际上曾存在过几个古渡口：洪山渡（设于洪山集镇，主要服务于省城与洪塘之间对象）、洪塘渡（设于洪塘集镇，主要服务于从洪塘到闽侯上街对象）、金山渡（设于金山塔寺处，服务于往来金山寺游人、香客）。此外，还有与洪塘毗邻的怀安渡（今称淮安，为海丝古官渡）。如今只剩下金山渡，且已名不符实（非用橹、篙、划桨、撑杆撑船，用的是长条麻绳牵引往返渡岸）。

洪塘古渡，除了充满爱情文艺成分的娘子接郎之外，据专家考证，自古便是疍民（水上居民）谋生场所，过去疍民们用毛竹制成竹排打鱼，用小船载人运货。万古闽江东逝水，千年历



洪塘渡口



洪塘古桥旧影

史弹指间，但见代代摆渡人！悠悠闽江水，古渡显繁华，“塔影江声随波动，渡口人声尽日喧”！

在洪山集镇与洪塘集镇之间元时即已一桥飞架，为石桥。据记载，明万历十一年（1475），在旧址重建洪山桥，与原仅有的另一座元时始建、连接福州城与南台岛的万寿桥（今解放大桥）并驾齐驱，竞相媲美，成为有福之州水上交通大动脉和繁华之重镇。另有一种说法，在洪山桥未建之前，毗邻古洪塘的古怀安早已砌成一座横跨闽江的大桥，至今仍遗有一个“大桥头”地名。

古时候，水道上的闽北木材、毛竹、土特产等物流，都要经过洪山桥，再到福州三保、义洲和台江码头，然后运往福州城内及南台岛各货栈、商店。里人、名流曹学佺曾赋诗《洪山桥元夕曲》赞道：“彩晕重重照碧虚，檐前疑是水中居。填翻桥路横如带，闭却灯辉不放舒。”那是一个时代的繁盛和人文江景。

洪山桥史上曾多次遭水毁，每当桥毁，又得靠小船摆渡，清代后期古桥终于逐渐取代了古渡。

新洪山桥建于1985年，位于旧桥上游几十米，至此旧桥废止，如今那儿仅存若干旧桥墩可供缓冲急流，并资作历史遗存。1990年，建起了福州城区连接闽侯的洪塘大桥。如今新时代的能工巧匠，正在着手总投资13.5亿元的洪山桥至洪塘大桥（洪山桥至三环路洪塘大桥段）拓宽改建工程。

今朝洪塘行，交通早便捷，隔江犹闻“月光

光”，格外美妙与亲切。

我曾写过一首《洪塘古渡》的诗：“青梅早已熟透在历史的树上 / 竹马也已收藏于民间博物馆内 / 欸乃声中 千帆竞过 / 依稀可见那娘子接郎的倩影 / 以及摇橹划桨撑篙的纤手 / 依旧回响着娘子问郎的缠绵呢喃 / 在经久不衰的《月光光》的古老童谣中 / 如今千古接郎船 自横 / 迷蒙的江面上 我在打捞历史”。

状元古街石仓园

洪塘，至今有一条古街依旧笑春风。

古街原本称为洪塘街，后因明朝年间里人翁正春高中状元，又得名状元街，一直延名至今。

古街长百多米，蜿蜒千余米，史上街巷纵横交错，繁华辉煌。如今古街仍可见大小店铺、木头排房，外墙陈旧，很见岁月。街面年久失修，杂乱无章，衰微破败。但是古街尚在、古厝尚存，没有轻举妄动，便是一种睿智远见，难能可贵。

我小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供销社（票证时代，足以自豪炫耀）、乡村邮电所、洪塘篦梳社、洪塘礼饼加工作坊等。

这里如今保护下了福州难得一见的明朝古厝状元府，为翁正春状元郎荣归故里时修建的府第。

“王榭堂前旧时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状元府前面两进主体建筑以及石板地面、部分窗花栏杆仍依稀可见原有面貌，以及当年刻字“状

元”砌砖，但一进失修，破损严重，二进前段时间已作修复，一二两进目前仍均为镇供销社员工宿舍。三进面积 1000 平方米，近年为翁家第 19 代后裔收回修复，修旧如旧，并有龙眼、古榕、黄皮果等古树名木相伴，雅趣盎然。整座状元府历史遗存，早在 1991 年被公布为福州市名人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我如今来此，重点寻觅凭吊的是状元街上远逝的石仓园。

我是老园林，且参与过园林史志编纂，早就对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里屈指可数、出类拔萃的私家古典名园——石仓园耳熟能详。更闻石仓园主人与我同为故乡里人，且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于是我爱屋及乌，情有独钟。

三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查找搜集资料，并多次与父亲、兄弟姊妹、妻女到状元街实地踏看，寻觅石仓园的蛛丝马迹。

据说，史上洪塘篦梳社和如今的洪塘片区管

委会所在地即为石仓园旧址。在我儿时印象里，洪塘古街有个洪塘篦梳社，曾经风生水起，遐迩闻名。有福之州乃华夏大地头梳三大产地之一，福州头梳为“福州三宝”之一，而洪塘头梳乃福州头梳中的精品奇葩。但篦梳社早已歇业。如今洪塘片区管委会所在地的“曹学佺闽剧社”，为洪塘社区老人活动场所，归老人会管理。我老父亲生前为老人会会长。父亲在世时，我每周回故里探望，均见老人馆内人声鼎沸，吹拉弹唱，丝竹声声，闽剧响彻街巷，穿越时空。

追溯史迹，我见史上石仓园丰富多彩，内涵深厚，无愧为一代园林大师、戏曲大家的精品佳作。

据一代园林艺术宗师陈从周先生考证，中国园林是“文人园”，发展到明清已经是成熟时期。而“明清官僚到了晚年，告老还乡，必置田宅，优游岁月，尽声色泉石之乐，故戏曲盛行，园林兴建”（陈从周《品园》）。家乐与园林，成为



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园景与曲景不可分也。古来大曲家又是大园林家”，“以园解曲，以曲悟园”。

曹学佺的石仓园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的。他出身贫寒，天赋才情，23岁就因缘水善论“舟战”而高中出仕，曾因刚正不阿，得罪权贵，两度罢官，闲居石仓园，精心经营之。

名人名园。石仓园集私家园林、万卷藏书楼、儒林班于一身，兼园林、藏书、戏曲于一体。而且曹学佺本人又是一个情趣横生，很会享受生活的人。

石仓书仓。相传，曹学佺建园时，慧眼识宝，从卖柴樵夫处首先发现寿山田黄彩石，将其收集作为镇园之宝，蔚成收藏寿山田黄石鼻祖，从此使田黄宝石名扬天下，广受文人雅士帝王将相喜爱，演绎成“帝石”、预选国石，数百年间又使无数掘采者、收藏家发家致富！我不知曹氏当时是否一鼓作气，跟踪追击广搜田黄彩石，填

满石仓，使石仓名副其实，熠熠生辉。据民间传说，田黄石为女娲炼石补天时遗留在人间的宝石，又说是凤凰鸟蛋所变，还说其可以驱灾避邪，藏之可延年益寿呢。石仓园藏书万卷，曹学佺又著书千卷，名列当时福州地区三大藏书家之一，闽中十才子之首，明末福建文苑复兴者，闽中文风因之昌盛。而且他是影响我国《四库全书》编写的《儒藏说》首倡者（周永年“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

名园梨园。石仓园营建于洪塘妙峰山下，堪称美轮美奂的园林苑：“园踞洪江之丽，四山回合，有塘数里，环带左右，一石桥跨沼上，古杉数株，挺然耸拔浮水面。”园子建成后，“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所罕有也。”《福建通志·列传》明卷十二“曹学佺”记载：“构筑石仓园，设池馆林木之胜，且蛾绿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自以为



乐。一时仕宦及墨客诗人游闽者，无不倾倒。”由此可见，当年石仓园日夜笙歌灯火，异彩纷呈，风靡闽地，而且影响深远，大抢游闽者眼球！且石仓园很有内涵，美景多多。清朝《福州府志》详记曹学佺自题石仓园二十景：“有浮山堂、石桥、临赋阁、春草亭、石仓、诸江亭、长至台、石君、听泉阁、夜光堂、梵高阁、森轩、梅花馆、林亭、涧室、荔枝阁、碧泉庵、竹醉亭、琴书社、南池诸胜。”尽享荣华富贵，极显辉煌鼎盛。曹学佺奇人奇才，睿智聪明，才艺双绝，什么都能玩至极致。

石仓园含金量相当高，内容很丰厚，形式多彩多样，是明清时代国情民俗的缩影，也是曹学佺这位悲剧性人物才情、爱好、性格以至宿命的彰显。原本价值连城，但当年清兵攻闽，曹学佺变卖石仓园，捐银万两助饷唐王隆武帝。之后三四百年间几易其手，如今早已荡然无存。

说来我与曹学佺算是有缘。回首往事，我在地方近40年，所待之处，处处皆伴有曹学佺的影子。其一，他与我同是故乡人，同饮家乡水。其二，我长期供职的园林部门，原先即坐落在曹学佺城里故居后曹里，一待二三十年。其三，我后来到石鼓名山任行政主官，这里是曹学佺经常出没的宝刹佛地，留下了很多善行佳话佳事，还保留有以曹为首的五贤祠，甚至相传曹在此殉节。

随着城镇建设的步伐的前进，洪塘状元街早已列入改造计划。我们期望这里的古街古厝改造，要慎之又慎，精心呵护，修旧如旧，保护遗

存，以寄乡愁。

父母之邦金山塔

我的祖厝原在洪塘下境状元街旁邱厝里，自祖父开始，便搬至洪塘上境金山塔寺不远处，已历百多年。

故乡金山塔寺，先有塔，后建寺，塔立于五代，寺建于宋代。这座塔寺也称闽江金山寺，以别于江苏镇江金山寺，是闽江著名景点，福州唯一的水中寺，洪塘“最是胜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

江山胜景，自有灵性神韵。金山寺塔，恰似一颗长浮于闽江的硕大金印，大概诞生于我故乡那曲《月光光》民谣盛名年代吧。犹如母亲绵绵不绝的胸襟情怀，父亲坚如磐石的中流砥柱。

洪塘江山代有名人出。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常见洪塘学子金榜题名。据《闽江金山志》记载：“洪塘前朝人物之盛为吾闽之冠而最彪炳者。”志中详列有先贤姓名及其官职达57人之众。而故乡历朝历代先贤名流，均在金山塔寺读书自习，立志成才，修身养性。自有塔寺旁浮雕人物长廊可资佐证。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洪塘古风淳朴，史上官宦名流颇负志气节气，留得生身身后名。

最负盛名的是明朝三大贤臣、悲剧名流：张经，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上司，七省经略，总督七省诸军，官至兵部尚书，“文武无双经

略，抗倭东南第一战功”，却遭严嵩及其死党弹劾诬陷，被斩首示众，一缕冤魂幽幽，后得平反，御赐金头。翁正春，闽王王审知丞相翁承瓚后裔，“明代状元第一人”，官居尚书，一代清官正吏风范，敢于直谏，后遭奸党中伤弹劾，疏请辞归，加太子少保，赐传车回故里，终老林下。曹学佺，官至礼部尚书，学者、诗人、闽剧鼻祖、藏书家。性情中人，厚德载物，贫贱不羞，宠辱不惊，生死无畏，精忠报国，清兵入闽，自缢殉节。“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成为改朝换代的殉葬品。曹学佺死后，家被抄，家人遭捕，藏书被抢光。逝值百年，清政府追谥为“忠节”。

衿衿学子，悠悠我心。金山塔寺周边早已蔚成一座学区，自有百年洪塘中心小学，并荟萃着

福州二十九中、福州工艺美术学校、武警学校、农行干校、岁昌学校，还有正在冉冉升起的民办中学——福州现代中学，还毗邻着高等学府福建农林大学、上街大学城等。

伴随闽江潮涨潮落，金山塔寺周遭八大景点遐迩闻名——“洪塘古渡”“石仓秋烟”“妙峰钟声”“半洲渔火”“云程石塔”“巴山风帆”“环峰夜月”“旗麓斜阳”。如今，一些景点已缥缈湮灭，却留下了月光路、石仓路、妙高路、半洲路、云程路、风帆路、环峰路、旗麓路等路名。

金山塔寺，我的父母之邦。我的父母双亲早年已在人生苦雨中缥缈远逝，我的故乡村庄和老家祖屋也已在时代嬗变中淡出消失。

再回首，往事如风；再回首，我心依旧！



金山寺

留在故事里

杨少衡

公元 1555 年，即明朝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倭寇数千人突然从水陆两途进犯浙江嘉兴。明军与倭寇激战，取得了史称的“石塘湾大捷”（一称“王江泾大捷”），在《明史》留下了一段记录：“至五月朔，倭突嘉兴，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中路击之，合战于王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

这段记载提到了几个人物，首先一位是“经”，即张经，为那场战役中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其身份是总督大臣，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他分遣参将卢镗、总兵俞大猷分头带陆军，参将汤克宽带水师合击倭寇于王江泾，取得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但是就在这场大胜之际，远在北京的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下了一份诏书，派出锦衣使者前来，任务却是逮捕张经问

罪。浙江捷报传到北京，给事中李用敬、闻望云陈奏，以军队取得大捷，倭寇嚣张气焰被遏制，此时不宜更换主帅，请召回锦衣使者。嘉靖帝大怒，以李、闻与张结党回护为由，将二人施以廷杖后削职为民。张经被捕到京下狱，受审时陈述剿倭经过，指出自任总督以来，先后斩杀和生俘



洪塘

倭寇共达 5000 人之多。但是嘉靖帝还是在刑部的判决奏折上批了个“准”字，于当年十月处死张经，斩弃于西市。一时间，“京师震骇，罢市数日”，“天下冤之”。

这位张经是福建侯官县洪塘乡人，其故乡现属福州市仓山区。我在这位历史人物的故乡读当年的石塘湾故事，感觉格外悲怆。

据资料载，这个故事主人公张经字廷彝，号半洲，生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张经祖上因“幼孤，母蔡氏携归外氏”而姓蔡，历五世，至其父蔡海亡后“乃复”，恢复姓张。张经体貌魁伟，具文才武略，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任浙江嘉兴知县。嘉靖四年（1525）入京任吏科给事中，后升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右少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协办都察院事。张经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兵部尚书金献民接受宁夏总兵钟放的贿赂，张经带领同官提出弹劾，金

献民因而告病辞职；河南巡抚潘坝匿灾情不报，也被张经弹劾去职。锦衣卫和东、西厂是专门侦察官民言行的特务机构，官校挟势勒索，大为民害，张经上疏斥其所作所为，建议予以撤除。嘉靖十六年（1537），以侯公丁为首的瑶族武装于两广起事，朝廷命张经任兵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前去平定，取得大胜。不久安南国相莫登庸杀其王自立，不向明朝廷进贡，又侵扰边境。明朝廷决定兴师问罪，派毛伯温等到广西，与张经会商进兵。张与毛一面重兵压境威慑，一面派使者入安南晓以利害。最终莫登庸向明朝谢罪，避免了一场战祸。张经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兵部尚书，隔年父亡，丁忧归乡。三年后朝廷起用他为三边总督，却被弹劾取消。嘉靖三十年（1551）起为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督理西苑农事。因母亡，丁忧守制。两年后被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隔年又被赋予靖倭重任，拥有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兵马大权，可从山东、两广、湖广有兵的地方直接行文调兵至东南剿倭前线作战。巡抚、操江都御史、副总兵、三司军卫、有司官完全听从节制。临阵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一应战守事宜，悉听尔便宜处置”。

张经由文知武，其胆略、战绩，特别是在两广平乱表现，促成他被朝廷赋予大权，重用以主持靖倭。但是这一战不好打。一方面倭寇势大，史书称：“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



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攻陷城市要塞，杀伤俘虏居民，抢劫夺取财帛，成一时大患。张经受命平倭之际，史载有倭寇2万余人，以南直隶松江的两个巢穴为基地，分道劫掠。两基地一个在柘林（华亭县浦东地方），一个在川沙洼（上海县八团地方青村南汇二所之间）。与之相对，则是官军战斗力低下，卫所各将位崇气骄，军队怯懦，遇倭一战皆溃。张经上任以来月月有警，官军偶有小胜，而多为倭寇所败。鉴于这些情况，张经决定征调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兵前来东南沿海，协兵进剿。在练兵待援之时，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朝野为之震动。

这时有一个名叫赵文华的人物出现在故事里。这人时为工部右侍郎，轻狂狡猾，炙手可热。这年二月，张经于前方抗倭备战时，赵文华上疏讲备倭七事，即：祀海神、降德音、增水军、差田赋、募余力、遣视师、察贼情。“祀海神”被赵列为防备倭寇头号大事。赵称地方官员“摄祀弗虔，神用弗享”，致使“遗灾民物”，因而应遣官告祭，使“神明翊佑”。但是海神庙在山东莱州偏僻海隅，不是倭寇经过之地，应在江南的江阴、常熟等处“设位望祭，以安人心”。如此抗倭妙计，恰迎合嘉靖皇帝迷信神仙方术的心态。七事中的“遣视师”即派重臣视察，“监视统抚”，也颇中上意。兵部尚书聂豹认为“总督张经奖率诸军，不必别遣”，遭到嘉靖帝怒责，被降俸处分，不久罢职。赵文华则因这份奏折说

动皇帝，被皇帝派为钦差，去祭海神并视察江南军情。赵文华到了浙江，自恃有靠山，以钦差监军自居，颐指气使，催促张经立即进剿倭巢。张经位望在赵文华之上，不买其账，因而激怒赵文华。适值倭寇四出劫掠，赵文华再三督促，张经回复说，倭寇十分狡猾且人数众多，等到援兵到达之后再进击，才能保证万全。赵文华认为张经瞧不起自己，便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害怕敌人贻误战机。还说张经惑于参将汤克宽谬言，“欲俟倭饱载出洋，以水兵掠余贼报功塞责耳。”这一上疏弹劾让嘉靖皇帝大怒，张经在劫难逃。

其时又有一位人物出现在故事里，此人叫作严嵩，为当时权相。史载，嘉靖皇帝决定抓张经，心里又有些犯疑，问于严嵩。严嵩拿内阁徐阶、李本两人的意见说事，称张经养寇不战，进剿是李文华、胡宗宪谋划，张经是冒功请赏。嘉靖帝听信了严嵩谗言。严嵩为什么要害张经？除了这个权相会揣摩上意，也因为张经与之不同道。张经勇于任事，不喜攀附权贵，具有明代士大夫典型特征。为靖倭事，张经与内阁次辅徐阶多有书信商议，与首辅严嵩却几乎没有书信交流，可见其对严嵩专权结党心存蔑视。另外还有一层原因，严嵩本人就是赵文华的靠山，义父，史书载，赵文华与严嵩“相与结为父子”。此刻干爹干儿子联手，把张经置于死地。

石塘湾平倭大捷，立下大功的指挥官却被抓去砍头，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昏庸由此可见。石

塘湾故事并没有至此结束，还有相关人物陆续出场。明穆宗隆庆时，俞大猷曾上代张半洲子辩冤书，恳乞穆宗恢复赐录张经浙直军功，无果。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张经孙张懋爵“诣阙讼冤”，神宗悯之，“复经官，赐谥襄愍”，给予祭葬。张经蒙冤被杀 45 个年头之后终于翻案，恢复了名誉（一说是隆庆初年恢复名誉）。经过数代相关人物的参与，石塘湾故事几经起落，至此画上句号，留在史册中。

但是这个故事里显然还有众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人物。这些人物存在于故事主人公张经的故乡，他们显然也非常应该留在这个故事里。

当年赵文华弹劾张经时，有一句话称张：“才足办也，特家闽避贼仇，故嚟啗纵贼耳。”说的是张经的才干足以指挥靖倭，但是因为福建人，想避免家乡为倭寇侵害，因此放任倭寇在

浙江作乱。赵文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拿下张经，连张的籍贯也用来做文章。放纵倭寇在浙江作乱，并不意味着福建就可以免除倭患，只有彻底消灭倭寇，才有望给浙江，也给福建除去灾祸。这样的道理或许只有奸臣和昏君才搞不明白。时至今日，在张经的故乡读赵文华这番攻讦，让我联想众多。当年那位总督大臣忍辱负重，在皇帝的猜忌、权相的压迫和钦差的掣肘中，谋划指挥石塘湾大战，或许确如赵文华所指，心里也在挂念自己的家乡？只不过并非因之纵倭作乱，而是更坚决地予以打击。我自知这一猜想无从取证，但是这位蒙冤屈死者的乡亲却在其石塘湾故事里留下若干笔墨，有如史籍上的记载，穿越时光，至今犹存。

在今仓山区洪塘状元街口，有一座张经祠堂。据记载，该祠堂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



张经祠堂现在是“老人之家”



张经祠堂石碑



张经墓 李滢 / 摄

(1600)，也就是张经冤情得以昭雪那一年，清乾隆、嘉庆年间屡有重修。祠堂原供有张经、戚继光、俞大猷塑像，两边有楹联：“文武无双经略，东南第一战功。”张经坟墓则位于福州原厝村芋坑山，墓前有“东南战功第一”的石坊，后人还在其墓壁上题对：“堪恨阶前无铁相，张坟何异岳家坟”，把张经比为岳飞，表达敬仰与怀念。张经早年生活的故地原名“蔡晋坊”，张经死后，乡人用其号，将“蔡晋坊”更名为“半洲街”，张经的名号与事迹从此留在福州的地名里，也以“半洲渔火”之称，列入当地著名的金山寺“八景”之中。其景有诗曰：“雨歇暮潮平，半洲集鱼舸。将星久已沉，仅剩寒江火。”诗中“将星久已沉”即缅怀张经事迹。在福州城，不经意间总会与这位抗倭名将相逢。三坊七巷文儒坊有张经故居，称尚书里。于山报恩定光多宝塔，俗称白塔，青

砖矗立的墙壁上，留有张经一首七律诗。于山碑廊现存有张经撰写的《四门学碑记》，相传是张在福州守孝期间所撰。水上明珠金山寺内外，亦集中了不少张经印记。前往寺庙的渡口处有一面浮雕长廊，雕塑十一幅历史人物故事，“抗倭名将张半洲”为其一，还有一面“张经抗倭”碑记。金山寺大悲楼前两侧各有一小配室，左为“怡怡斋”，俗称“文昌阁”，相传张经在此读过书。右侧“借借室”门前挂着张经所撰对联“蓬窗剪烛孤单剑，草屋禁风静掩扉”。金山寺观音殿内，亦有张经撰联“露白秋江鸥一梦，月明寒渚雁双归”。这些印记无不表现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460多年前的大战硝烟早已消散，石塘湾故事到这里似乎才算完整。除了记在典籍里的起落荣辱，还有人心对故事做出诠释，并留在故事里。

书生本色

唐 冈

有明一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最长，达48年。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200多年的漫漫岁月，当年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制度，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官场以及社会的种种弊端，一一出现，乱象纷呈：科场舞弊，官员渎职自肥；豪强富户，仗势凌弱，兼并土地；江南水灾不断，辽东边患正紧，国家财政窘迫日深。万历之初，张居正执掌朝政，他试图扭转朝纲，实行了一系列变革。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制皇室开支，以求节流；另一方面清理赋税制度，清丈土地，以求开源，并综合前人经验，在全国推行新的赋税制度“一条鞭法”，统一赋税，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亲政，改弦更张，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社会陷入动荡，明王朝灭亡的序幕由此拉开。

一边是官场黑暗，另一边是大量读书人通过科举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官场一时成为文人品格的试金石。由于朝廷规定，入朝做官的均应由科举出身，所以，博取功名、蟾宫折桂成为许多读书人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成为社会办学和学子勤奋攻读的强动力。明代，除强调学历，明文规定“非科举者不得与官”外，还形成“非进士不

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规则。科举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而进士更是受到推崇。

明代福州朱子学盛行，基层教育十分普及，不仅有府县儒学、书院、社学，还有村学、书堂、家塾和教馆等。翁正春就出生在洪塘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担任过建阳教谕和浙江府通判。官职虽不高，但父亲严谨的为人和治学态度，给少年翁正春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里地处福州西郊，却靠近出入会城的重要码头洪山桥，因而来往的人很多。不但有商贾，还有官员和文人。因为许多学人赴京赶考的中途休息站，读书科考之风，也在这处近郊的乡镇愈发炽烈。以



洪塘渡口的翁正春事迹浮雕

致明代洪塘街名人辈出，乡间文风之盛，冠于八闽。江边有一座四面环水的金山寺，历来是文人墨客最喜登临和游玩之地。明代金山寺为洪塘乡间的文昌阁，也是当地文人聚会之所。因为地方幽静，张经、翁正春等人幼年时都曾在这里读书。金山寺有一株400多年的老樟树，至今枝繁叶茂，相传就是翁正春读书时所植。登楼凭栏远眺，但见九峰环簇，一水奔流，倍觉天地壮阔。张经咏金山寺诗中就有“楼阁几层摩日月，江湖千古集衣冠”的句子，赞美金山寺形胜之佳。万历二十年（1592），翁正春赴京参加会试，一箭中鹄，殿试赐三甲进士第一名。捷报传至家乡福建侯官洪塘村，举村沸腾。

于是，39岁的福州才子翁正春借科举之风，进入万历朝廷，先任翰林修撰，之后是左中允、少詹事，一直处在机要秘书的行列。但这也是历届进士进入内阁的必经之路。

关于翁正春，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文字记载并不多，但《明史》有传。十分简略的文字，已经勾画出一位忠于职事、作风严谨的正直文人形象。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发生日食，百官惶恐不安，认为国家要出大事。只有翁正春极言不能将国事和天象联系在一起。他还列举了过去也曾发生过日食或月食的年份，但国内并没有发生灾祸的事例。因为翁正春平时“风度竣整，终日无狎语”，说话做事十分严谨，听了 he 这一席话，朝堂上顿时安定下来。

第二年（1611）秋，万寿节时，百官纷纷

向皇帝庆贺，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万历帝听得十分惬意。这时翁正春却满脸严肃地呈上“八箴”。这“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箴言，就是劝诫。许多人都为翁正春捏了把汗。翁正春却认为，见皇帝一次不容易，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就不管皇帝老儿高兴不高兴了。祝寿上八箴，显然不合时宜。但无疑，这八项劝诫，句句在理。朱翊钧虽然脸上不快，也只能强忍着点头称是。

借着万历皇帝庆寿高兴，吉王朱翊鋐上奏请封支子朱常源为郡王。万历正要答应，翁正春却从朝班中出列，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朱翊鋐之封在《宗藩条例》已定之后，其支庶宜止本爵。万历皇帝只得作罢，改封朱常源为镇国将军。



金山寺古樟树



翁正春故居

琉球中山王遣使入万历朝纳贡。朝议中翁正春认为，中山国实际已遭日本吞并，来的使臣多是日本人，贡品也多是日本物产，如果让他们入朝，等于承认中山是日本的一部分，这样不妥，应该让福建地方政府接受他们的纳贡，以此表明我国的立场。万历朝廷最终采纳了翁正春的意见。

由于翁正春始终保持一介书生本色，敢于说真话，自然得罪了一些人，几次遭到弹劾，但他依旧不改初衷。天启元年（1621），翁正春出任礼部尚书，并协理詹事府事。宦官魏忠贤结党营私，朝中一些官员和他来往甚密，沆瀣一气。翁

正春不但不趋炎附势，还经常主持正义，惩恶扬善。天启四年（1624），左副都御使杨涟列举24条罪状弹劾魏忠贤。翁正春也附议上疏弹劾。这让魏忠贤又惊又怒，在收拾了杨涟之后，他把矛头对准翁正春，说他是东林党魁。一气之下，翁正春上疏乞归。得到皇帝允准后，已经70岁的翁正春回到家乡洪塘。

翁正春文思敏捷，才华过人。相传有一次当朝首辅叶向高到翁正春家探望。叶向高是福清人，与翁正春同是福州乡亲，而且意气相投，很谈得来，闲暇时还常在一起吟诗作对。这天两人谈兴正浓，不觉夜幕已降。叶向高说，今晚我只得在你这里借宿了。翁正春十分高兴，随口说出一句上联“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思索片刻，对出下联“客官寓宦宅，富室宽容”。上下联九字全带宝盖头。第二天，翁正春送叶向高进城，路过一处池塘。叶向高见池中鸭子戏水，随口吟出一上联“七鸭浮塘，数数数三双一只”，翁正春见塘中有鱼，不假思索便对出下联“尺鱼跃水，量量量九寸十分”，对仗工整，富含深意。两人会心一笑，继续赶路。

可惜，就像叶向高两度入阁担任首辅而难能有大作为一样，翁正春也只能恪守自己的书生本色，不随波逐流，保持了一个中国文人正直的品行。

家乡的人们没有忘记他，翁正春的轶事在坊间被津津乐道地流传，他故居所在的这条街，一直到现在，人们还称作状元街。

旧物新拾

林 山

美孚油灯

这是在闽清古民居见到的一盏灯。

白瓷烧制，还有开片。造型很美。上面是繁体毛笔字“请点美孚油”。“美孚”中文意思就是“美观可靠”，“美”又是美国的简称。实际上，“美孚”是美国一家油品公司。

美孚油刚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先进入城市。就是先挨家挨户送一盏带有玻璃罩的马口铁廉价小煤油灯，免费赠送，煤油灯里还带二两煤油。

居民白得一盏煤油灯，白点了半个月，而且比老油灯亮，还免了油烟熏，太划算了，许多人就用了。

当然，二两煤油点不了多久。差不多半个月，油灯里的煤油用完了。还想用，就得自己掏钱去美孚油行买煤油。煤油倒也不贵，于是家家户户都继续点煤油灯。美孚油行的中国市场就这样打开了。

1885年美孚油公司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公司，1908年福州也建立了美孚油分公司。

城市有了电灯后，美孚油行把煤油市场向农村拓展。美孚油公司组织了一个个油漆大队，铺地毯式，进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到处画油漆广告：“点美孚灯，美孚老牌油，鹰牌油烛灯。”

在闽清这里，因为是瓷乡，自然因地制宜，烧制白瓷煤油灯，比较容易让老百姓接受。

当年媒体常刊登广告，如：“敬启者，本厂专办德富牌火油，其油发光极亮，系甲于天下者，其油装在无嘴之马口铁箱，故不致有不虑之事也。美国牛约城德富油厂告白。”

后来，清廷因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方面的考虑，曾发布禁用煤油灯的规定。光绪八年（1882）11月19日，福州官府下令，不但街上不准挑卖，连店家也一律禁止，各店有存货者也不得出售。理由很充分：城内外人烟稠密，街巷窄狭，木屋毗连，近年来每遇火患往往延烧多家，起火原因，都是煤油灯失慎酿成。过去民间点灯均用

豆、麻、菜籽等油，鲜有失事。如今居民铺户每多贪贱购用煤油，殊不知此种煤油最易引火，点用之时稍不得法，立时火焰飞腾燎原，扑灭不及，屋物顷刻成灰，邻居同为焦土，实属贪小失大，害己损人。灯油为日用之必需，其改用煤油所省有限，取祸甚重。不若仍用豆麻菜籽等油，以期保全身家平安无事。规定，以后不准再用煤油点灯，不得将整箱煤油收藏屋内。违者从重惩办。

保护主义毕竟不能解决问题。如今，油灯成为“古董”，电灯也已更新换代了。



美孚油灯

箸 弄

在旧货地摊，看到几个装筷子的东西，过去是专门用来盛放筷子、汤勺等餐具的，我们叫“箸弄”。通常是上宽下窄的矩形，背板上部有两个孔，用来绑绳子，好挂在厨房墙上或碗橱边上。底部有几个小孔，供滴水通风之用。如今，很少人用，除非很乡下的地方。

箸弄常见的有陶制的、瓷制的、竹木钉的和瓦泥烧的。后来有塑料的。如今店铺用消毒柜装碗筷等餐具。

箸，就是筷子。箸是形声字，从竹，者声。两千年来一直用着。据说，到明代才逐渐称呼筷子。福州方言到现在还是说“箸”。读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说是，吴中民间俗讳，因“箸”同“住”音。江南行舟讳言“住”，所以把“住”改为“快”。因为多是竹木制品，箸便叫成筷子了。以后，一些读书人也渐称箸为筷。

据说，当年台湾海基会辜振甫和大陆海协会汪道涵会面时。汪道涵送给辜振甫的礼物是筷筒，有些人看不懂。严复的长孙女婿辜振甫则心领神会，回赠给汪道涵一个笔筒。大家琢磨琢磨，恍然大悟：筷筒，不就是寓意赶快统一嘛。笔筒，自然就是表达必定统一的愿望。

民以食为天，古人讲究饮食，也注意餐具的清洁。酒杯有杯盒，碗也装盒，箸就盛放于盒或筒。饭后洗涤干净的箸，不能乱扔乱放，要放进



箸筒，上联（左边）竖写“文章千古事”，下联（右边）竖写“忠孝一生心”，中间则写的是“左飧右粥”

箸筒，不受脏污，既简便，又卫生。

箸弄，有些地方称之为箸笼、筷筒、筷桶、筷笼子等等。

这几个箸弄中，我看中一个有对联的。唯恐失之交臂，稍作还价，就收了。到现在还庆幸当时的决断。

这箸弄不同于我们当地常见的陶、瓷或竹、木的，而是砖瓦泥模烧雕的。上面有文字，还比较特别。因为常见的箸弄上面的文字，大都是吉

祥祝福的意思，如“一泰平安”“世界和平”“百子千孙”“财丁兴旺”“长命宝贵”“自力更生”等等。而这箸弄，上联（左边）竖写“文章千古事”，下联（右边）竖写“忠孝一生心”，中间则写的是“左飧右粥”。

上联的内容比较熟悉，知道是出自杜甫的《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千古事”应该是倡导立德立言立功的意思。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博取功名。下联意思非常明白，也查了一下，是出自宋朝陈岩肖的《庚溪诗话（卷上）》。说苏易简在翰林时，有一天，太宗召对赐酒，出句：“君臣千载遇。”苏易简应声对句：“忠孝一生心。”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要求对国家忠诚，对家长孝敬。要求用心，还要求用一生来践行。这种家风传承，满满正能量。

中间的四个字，看时都明白，就不知道哪来的。查了一下，原来出自韩愈的《平淮西碑》：“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左飧右粥”才回到主题。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是正事。能够“左飧右粥”，就是太平盛世啊。这是餐具，不是黑板报，但是，在有心人眼里，一个厨房用具，居然也这么用心设计，如此有文化教育内涵，真是家庭教育的好载体。你看看，每天三餐都要吃饭，每次吃饭都要去取餐具，都要看到这些文字。吃完饭，洗好餐具，放进箸弄时，还要复习一下。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啊。

如此经典的箸弄，可算是提升版的座右铭。

鼎边糊和碗糕

陈 三

住在城南白马河边一条叫“纸道街”的小巷时，每到农历三月底四月，水汪汪的清早，有时是从江中行船的鸣笛声中醒来，有时是从邻居一户人家中的笛声中醒来——后来，那位吹笛的少年成为中科院地质考古的一位大专家——还有的时候，是从小街的叫卖声里醒来。那些悠远的叫卖，有中年女人的“炒米”，不必回想她的“其马酥”和“雪片糕”“软油饼”，只要回想到她如唱歌一般叫卖“炒米雅好吃”的清脆的嗓音，我的舌下已然生津。还有的叫卖人，那个橄榄油色脸膛的老头，如日本电影中沉默的父兄，他只不时

轻轻一击担前的铁片，“叮叮”声仿佛是一道闪光的蛛丝，里面带着蜜的甜，把一街多少儿童飘摇的念想牵系了。谁家的大人叫一声“卡卡糖（丁丁糖）”，让他歇下担子，拿出糖凿，像现在要开喝一块茶饼一样，工具先行一步，就让人心中暗暗起了赞叹，是的，这必将引起其他孩子深深的羡慕。而四月的清早，林林总总的叫卖声里，叫卖梔子花的声音，是匆忙而且不是很用心的。

“水……支……”“水……支……”那是卖梔子的妇人一早挑着花担，或推着装满梔子篮子的自行车缓缓行走在深巷。



到了我离开这条小巷，搬进“城中”前，我读到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他这样写道：说也是怪，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梔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个真的就是梔子花。

廿四番风容易过，此时的花事，开尽荼蘼了，轮到山野气的梔子花“快闪”，霸气土气野气全然上身，就这样闯入春的光艳，它的花期和枇杷的果期一样，并不长（奇怪的是，近几年常常在园艺坛里看到它几个月的花期），好像只有几天。“那轻，那娉婷，你是”的四月诗句不属于它，“柔嫩”也不属于它，但是“喜悦”确实在它欢天喜地没心没肺的开放中跳跃着。

这时候，立夏就倏然、猝然来了。

立夏来了，既来之，则吃之。

立夏来了，就要“做夏”——咱们“民以食为天”，把二十四节气整出来后，每个节气也都安排了可以大快朵颐的物什，把节日过成以风味小吃为主的美食节日，犒劳自己的耳鼻口舌和肠胃。我们的民族多么有智慧，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有足够的审美情操，才能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完美结合，取得双丰收——做夏，就是做鼎边

糊和碗糕。

时光如飞刀。

一年过得一年，今年的立夏本来答应给小孩做鼎边糊，但竟找不到磨米的加工处，于是只能在街边的摊上买一碗聊以塞责——不能不感叹，过节气氛最浓的是小时候的日子。

立夏前一天，每户人家中都有一个人，或老或少，拿着一小袋大米出门去附近的一家碾米厂把它加工成浆。当然有少数几家大户，他们宽敞的厅堂中，也搬出尘封的石磨，在家里自己加工——这种对城里生长的孩子来说，它是诗意的工作，如果是独自一个人干这活，磨一会儿就心生枯燥。但一年只干一次，而且只有个把钟头的活，孩子们像是中了汤姆索耶的毒，宁肯用苹果或玩具来换得他被罚劳役。

一圈人围在磨盘边，一个人挥臂磨，一个人



用小勺子往石磨的小孔中注水添米。干活的少年都已稍稍长大，因此尚能和平友好互相礼让，自己玩一会儿，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因此磨浆工作在轮岗中飞快完成。

浆水汨汨地从磨槽中流注下来，一缕缕滴到早已盛在那儿的锅或大盆。用它直接来做鼎边糊即可。但很多家的浆磨好后，把大半部分装入布袋，那种厚粗布做的布袋，放在大洗衣盆上斜架的洗衣板上，上面压着一块石头，这是一道控水程序。滤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可以做锅边、碗糕了。

做锅边的米浆并不要控得太干。用大火烧开鼎中小半锅水，趁着大火热锅，把米浆环绕着锅的未被汤水浸过的上半截，即倒即熟。技术好，倒得又薄又均匀，一熟就用锅铲刮起，像蛻皮一样，一片片干米浆的“糊”就一卷卷的，整齐地落在汤中。汤中加了葱、熟鱼干（鲞鱼干）、虾米等，一碗碗端出。中午的饭常常摆在门口吃，这一天更不必说。一群的表哥表姐，围桌而坐，大快朵颐，吸溜作响。

一边吃，忽然又想起某家锅边做得地道，有人不同意，则举证另外一家的好吃。

自己家做的鼎边糊，其实与当时店里做的并没太大差别，货更足、量更多而已。不得不承认，以前的鼎边糊做得比较认真，同时物资虽然匮乏，但物真而自然，绝无这么多添加剂或色素。比如商家买了虾，他们倒是不舍得把虾拿来煮锅边，那也太奢侈了，但他们会把虾身子剪



开，虾仁留下来之外，把虾头、虾尾、虾皮统统放在锅里煮成汤，这种高汤，能不美味？还有蛻子肉。这种极贱、极便宜的小贝壳类，在我小时候，可以在白马河里摸到，城市内河、池塘里也大多都可见，商家买来，把它熬煮出汤来，再把一个个蛻子肉细心剔出。这些都是鼎边糊不可分割的肉身。你说这种制作，能不好吃？

可怀想的，就是那些旧日商家制作鼎边糊的精心。

鼎边糊常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其团队标配有两种。一个是油条、油饼，一个是碗糕或三角

糕。立夏里与鼎边糊匹配的，更多是碗糕。碗糕的主要用材也是米浆。

家中日常要做碗糕时，常用的工具是瓷的酒盅——像玩具小碗，先把酒盅内壁抹上点花生油，倒入米浆，上面撒些芝麻，放入蒸笼——一种方言称之为“算”的藤编炊具。简装的也有，直接放在一个篦子上入锅蒸，讲究的在炊具里面放荷叶，但藤条蒸的，本身已有一种草木之香。锅中加水烧开，把“算”放入锅，将碗上屉，旺火蒸 15 分钟便熟。

叉腰等水开！或者捻几只枇杷，坐在灶前吃得酸眉一攒。

开锅啦！

怀着一腔雀跃的贪吃婆之心，烫手也不怕，吸溜吸溜地把小盅弄到桌上。不知何故，每每都不自觉地把两手的烫指头捏着自己的耳垂。紧接着，取一根竹篾（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手工组，很多妇女在家把竹篾剖成细条当缝缀用的“针线”，

缝合斗笠中的竹蓑，使它缀成一片），轻轻地在碗沿刮，把米糕剥离碗。看它已涨得开裂的白嫩嫩形象，此时像一只小兔子一样轻轻一弹，贪吃的心不免一抖，食指大动了。

碗糕做得好，发的时间不长不短的话，它的口感暄松、绵软。

据说，立夏里吃碗糕，可以明目。

这个说法使它的立意与鼎边糊等价——鼎边糊里含的蚬子壳熬煮的汤也有清心明目之作用。后来读地方的文史掌故，文史专家郑丽生先生的《福州风土诗》中有“梔子花开燕初雏，余寒立夏尚堪虑。明目碗糕强足笋，旧蛭买煮锅边糊”，证实了这一说法。

民俗过节，常寓意深远，而以吃的方式传播，就把寓意像蒲公英一样吹开，种子四散成了地方的集体记忆，成了当地民众的 DNA——就像说起油条，我们叫它油炸鬼（油炸桧），象征着对英雄岳飞悲剧命运的同情，对害人的秦桧夫妻



的诅咒或愤怒。随着年代推移，很多情感渐趋式微，但这种故事常常在不经意间被父母长辈传授给孩子，同时也就把民族的情绪传给下一代。鼎边糊，我们至少有一种传说耳熟能详，那就是与戚继光有关。戚继光入闽始于1561年，离开福建是1567年，福建各地留下了戚继光平倭的战绩与故事，像“光饼”“鼎边糊”就是同类故事：话说有一天，戚家军歼灭倭寇后，当地乡民备下丰盛的菜肴准备为官兵接风。就在准备得热火朝天时，戚家军接到报告说又有一批倭寇来袭。因此戚将军命队伍马上集合，准备出发。百姓们着急，也心疼官兵们没吃饭就又要上阵杀敌护民。于慌忙中有人想出主意，就是将米浆用肉丝、金针、木耳、蛭干等混在一起煮成美汤。米浆过锅边，顷刻即熟，不消几分钟，一锅锅都煮好了。将士们饱食后上阵，将倭寇全部消灭……

地方的记载很多，也使得食物因之而被赋予了许多情感。

和郑丽生先生一样，对民俗文化有许多记载的萨伯森先生笔下也吟过一碗鼎边糊：“半洲庙畔鼎边糊，午夜开售到晓无。雪片皑皑汤弥弥，一盂滋味尽称腴。”

萨老出身世家，却在不可描述的历史时期中，困厄贫蹇，几至断炊。他曾写过一首诗，中有“老饕多少愧居贫”。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很多，但价昂却只能让人兴叹，鼎边糊至少没那么贵，它跟粥价格一样便宜。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吃过很有名的“半洲庙

畔”七省经略庙前的鼎边糊摊——那儿似乎离我家很近，但最初，我哪知道它很有名？我记忆中最有印象的是另一家无名的摊，那就是白马河边的另一头，那家鼎边糊摊我吃了几年。其间也并未发生什么事，只是时间足够久，印象便也足够深。那时候，我每天要骑大约一小时的自行车上学，早饭来不及吃，就在路边的鼎边糊摊吃一碗两碗，热热的，顿觉一股热气直入丹田。有一个大冬天晚上，我读过《郑板桥诗话》中的一封给弟弟的信。次日早晨，在街边的摊中吃鼎边糊时，突然心中非常感动，因为我想起了昨晚的那段：“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周身俱暖，呵，这个美好的赐予。

恢长的初夏，午睡醒，突然听到楼下长一声短一声的叫卖：“喔——喔——”这个发音“喔”的东西，是马糕。下楼买了几片尝尝，跟小时候吃到的“喔”是两回事了，因为以前的“喔”是人家一杵一杵地手工舂出来的。现在恐怕只是机器的产物了吧？除此之外，它的配料恐怕也在这个污染日深的年代里发生了某些变化了吧。鼎边、碗糕的制作何尝不是呢？更何况——比如今天，我上街买的蚬子，一斤8元，半碗不到，已经是水产品里的便宜货了。在这个年代，谁耐烦为了两元钱一碗的鼎边糊把它剥开，露出肥白的肉身？也许只有大酒家里，有兴致吃点乡味的“包菜包包菜”等菜式里可见。可是已离我童年、少年记忆中的鼎边糊，仿佛两世的人生。

光的饼

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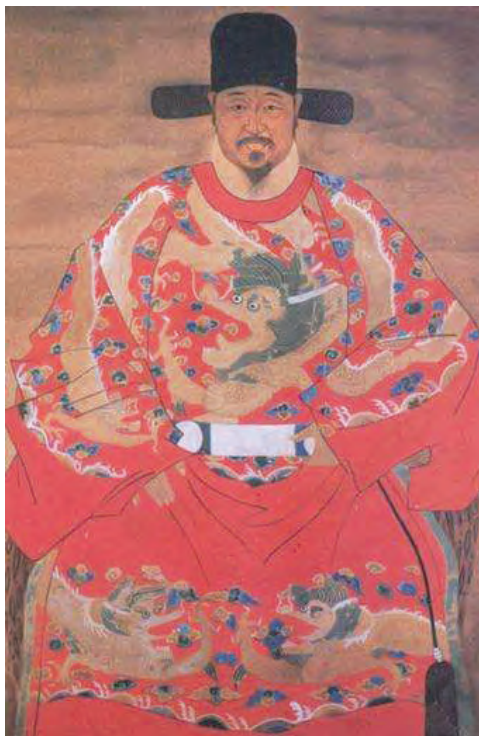
1

一个人以饼的样式至今活着。

这个人叫戚继光，今天的史书上给他的称号是：军事家、民族英雄、武术家。稍微翻阅一点儿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一个小节，他是明朝抗击倭寇当之无愧的猛将功臣。

但此刻放在我右手掌上的小小圆饼，已经如此民间化、风俗化，名不见经传，教科书上毫无记载，只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风物志上有那么一小笔带过，所以，我看着它，就像看一块普普通通的田间小石——可它是灵气的，小孩子一样会说话，每每在我掌心逗留，似乎总是要告诉我点儿什么，引我遐想，于是生出为它写字的念头。这些年来在福州生活，我也见它多了，常常我会特意去街边或者巷子里，买上几个，当作午餐，吃得我唇齿之间都是面香……福州人把“佛跳墙”当作招牌菜，酒宴上必备给外来客人，以示福州

风情独特的饮食文化；可我不平了，为什么这种街巷到处都有的小面饼，那么深入人心、那么源远流长的大众食物，不给贵客们一显福州饮食文化的一绝呢？真是的，就因为太普通、太民间就



戚继光画像

不能登大雅之堂了？浮华之风使然。异乡人来我家，我端出一盘这种小面饼，定然告诉他：这是福州特产，这是英雄饼，这是光荣饼，请吃！

福州人还是给了它这么好听又特别的名字：光饼。多么有文化啊。

起名的时候，是无法考究什么文化色彩的，兵荒马乱，战况危机，情急之下以饼充饥，只能匆匆来个最简单的叫法，有幸领军人物是戚继光，沾了这个“光”字，反击战大捷后百姓们就随口叫作“光饼”了——当然，福州人是有心人，也是懂得感激的人，他们感念英雄为民除害，如此命名乃是纪念。这个纪念的心意一直沿袭400多年，虽然英雄早已作古，他们却让他在面饼上活着，岁岁年年！2018年是戚继光诞辰490年，在他遥远的家乡山东蓬莱，自然要有一些纪念事宜，可是戚氏后代们是否想到在东南沿海还有许许多多的面饼，正承载他们先祖的灵魂，仍然在世上为百姓造福？福州人吃光饼差不多是每天的事情，越是寻常百姓，饭桌上越是离不开光饼。海鲜可以价格猛涨，肉价也已经居高不下，青菜粗粮都渐渐身价不菲了，可光饼仍然论几角钱一个，钱包不鼓也能够随时购买，权且果腹，即便当作早餐或者晚饭饱食一顿，也是正常。而收入微薄的平民，享用它们则是自然的了，真是实惠又方便。这倒是符合光饼诞生时的历史地位——它本不是富贵大餐之物，乃源于救急和救难之需。



2

福建人给了戚继光这份特殊的礼物，用一种食物永远传播他的丰功伟绩。每个光饼作坊都知道光饼的来历，把自己制作的光饼卖给客人时，他会脱口而出讲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多好啊，这么一种传播渠道，远比什么媒体炒作或者报告会演讲更根深蒂固，400多年前的福建沿海抗倭公案以及戚家军的了不起，就这么在小小的面饼上定格了。

光饼的制作工艺不复杂，面粉、盐巴、木材炭火，就这些。当时戚继光率军征战猖狂的日本海盗——所谓倭寇，这些杀人放火抢劫民财的恶棍集团军，比蝗虫之害还让人色变，整个东海之滨战线颇长，戚家军从江浙一带一路追剿，倭寇如同狡诈的蛇龙，首尾相接兴风作浪，祸患达至广东，戚继光与他们周旋十年，才彻底赶跑倭

寇，让他们滚回老家——我想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的首页胜利吧，与后来的一连串屈辱状况形成强烈的对比。倭寇虽然不是日本的正规军，但是他们的兽性造成对中国人的残害，不亚于近代史上的侵略之苦。福州多绵绵阴雨，战况紧急下，将士们的用餐不能过于讲究，任何讲究都派不上用场。为了赶赴战场，为了不被消灭，所以戚继光命令他们把面饼串起来一摞挂在脖子上，节省宝贵时间以抗敌。

今天的光饼的饼面中心仍保留用于穿麻绳的小眼儿。但是，没谁再使用麻绳串起来一次吃

十数个光饼了。小眼儿的存在，恰好让我们可以想起当年，这化石般的象征作用仍完好体现在这一小食物上，实在是一种文化妙趣。工艺的发展明显在光饼品种上下功夫了，400年前不过是面粉食盐炭火迅速完成的食物，现在饼面上撒芝麻了，还可以剖开夹肉、夹菜、夹海苔，味道变着法儿丰富起来。所以，眼下如果酒席上偶尔出现光饼待客，都是光饼秀了。

当年戚继光率军消化了无数光饼，肯定是最简易的做法。我买光饼，专门选简单朴素的，就是想尝尝那种英雄味道，品出面粉本身的香气和



于山戚公祠

食盐固有的庄严。对了，还有一种加糖的光饼，叫“征东饼”，饼面大一圈，顾名思义，名称出自戚家军征战东洋人。福建是甘蔗产地，濒临大海不缺食盐，盐和糖同是百姓厨房里的基本。400多年前做饼，哪里能奢侈？只是取之民间平常物罢了。

3

没法儿不欣赏戚继光！为了写一写光饼，我翻阅了一些史料，发现了更多这位民族英豪的千秋业绩。他出身宦官世家，先祖曾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被朱皇帝世代加封爵位和官职。但戚家受封，在朝廷在地方从不失英雄本色。继光太祖以来被委任驻扎蓬莱，保卫山东沿海，几代人都被当地人称颂当官为民。到了继光，年少即担当军职，青年时已屡有战功，所以能在倭寇横行时，即被朝廷任命担当抗倭统帅这一重要职责。戚继光抗倭那份认真劲儿，是军事史上罕见的范例。他不是匆匆一战，或者做做模样，然后坐享其成。他也不是一介武夫，赤膊上阵舍了性命算是为国捐躯而罢。十年在沿海栉风沐雨，和敌人斗智斗勇，戚继光作为军事家的韬略胆识，让我们看到帅才的重要统治力。同时，他的为国征战全力以赴，有智者的大勇大爱，更弥足珍贵。从他招募兵勇组建戚家军的方式，到他发明新式兵器的用心，都显现他的军事奇才，展示出真正的英雄气派，那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彰显。举例他说

过的一句话吧，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如果读者更有兴致，不妨到网络上搜一下他的三首诗《过文登营》《马上作》《题武夷》，也可见这硬汉的宽广胸襟。

今天的《蓬莱县志》《登州府志》等都记录有戚家的功勋。戚继光抗倭，他的兄弟、妻子也统统上阵并肩作战。他给五个儿子起名祚国、报国、兴国、安国、昌国，难道不使我们领会他对国家的一片赤心？

抗倭胜利后，他被调防到京城附近，担任蓟州16年军事防务。那才叫再立新功哩，戚继光一如既往的认真劲儿，继续发挥了功效，连张居正也倚重他。

告老还乡后，戚继光并未歇息。他修缮蓬莱阁，为家乡人做益事。可惜英雄不到60岁身逝，留下一曲意犹未尽的挽歌。他除了武功建树之外，还著述军事名著两部，《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史又称他为武术家，因他在太极拳上还有些建树。

古代战将很多，留下英名评价不一。但是，既非战死又非殉国而留下盖世英名的并不多见。三国中的赵子龙是小说中人物，未免包含虚构成分。可戚继光是史书彪炳的真实英雄，他用他戎马的一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光荣注解。

4

光饼我们还会继续吃，这是百姓们的必需。

民间化的东西不容易消失，所以我们将此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既然满汉全席可以是被宣传的饮食作品，那么，光饼何必谦让呢？

光饼可爱，不仅在于面味馨香。这一点北方的烧饼、饅、馍，咱也不敢小瞧。我甚至怀疑光饼为戚继光所选择作军粮，也有他北方人的口味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当年架火烙出面饼，急用军务，是否戚继光亲点面食，由于他

是山东大汉呢？光饼可爱，

却还在于它的形状体积色

泽，与北方面品那些大

咧咧的粗制大不同。

光饼小巧玲珑，置于

掌上，所以更让人

喜爱，如我这样在

北方长大的女人，冷

不丁在南国看到饼这

么袖珍精致，心下不由

惊异欢喜了，加上色泽奶

白与焦黄分成两面，吃起来，

真是享受啊，你都不好意思浪费一

点点。这和我吃竹筒虾、鱼丸、海蛎饼、生蚝一

样，由于南方人饮食精致，进餐时会格外体会厨师的良苦用心，而不舍得滥用。戚家军制作光饼

时，肯定有南方传统文化的融入。

我买来光饼后，往往会拿起来端详一下，因为它们像可爱的小孩，也像可爱的某种饰品——比如一个光饼用丝线从小眼儿穿过，如果挂在胸

前，我想不会难看。时常有大胆的女性把很大的金属制品挂在脖子上、耳朵上，显得个性突出。

我觉得一个光饼也不会逊色，兴许让人想起土著风格、原生态之类的，谁试试？也不一定是笑话。

戚继光采用民间最简单的聪明，让将士们把光饼挂到脖子上，方便充饥。这并不是愚笨地只

能吃半个饼的讽刺，多亏光饼制造

者，南国文化的小巧灵活，

多多益善，戚家军食用光

饼，信手从胸前取来，

那才叫带劲儿。

5

日本人来福

建，他们吃光饼不？

他们晓得这光饼反侵略的内涵吗？

史书上真该把光饼写进

去，尤其是教科书上，光饼应该列

入抗倭一节多写几行字。什么叫民族尊严？什么叫人民的力量？什么叫拥戴民族英雄？这种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福建沿海从宁德到莆田，有不少地方至今仍然在祭奠戚继光，纪念馆有，碑刻有，雕塑有。

然而，我却认为最大最好的祭奠和纪念是光饼。

买一个光饼吧，吃一口，就回忆起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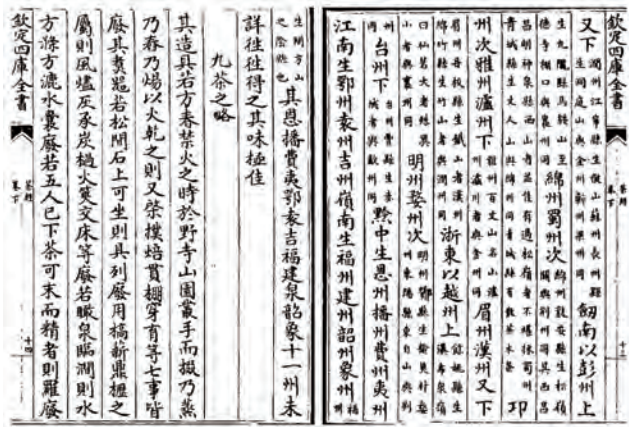
方山问茶记

三米深

唐元和年间（806-820），福州方山寺有个名叫怀恠的和尚，奉旨进京为宪宗皇帝讲经说法。长安城万里无云，怀恠和尚神清气爽，在麟德殿上出口成章。唐宪宗龙颜大悦，当庭赐饮御茶。御茶伺候的是天子的胃，按理说是普天之下最好的茶了。可怀恠一饮而尽，却并不解渴，他告诉皇帝：“圣上，您的茶还没有我们福州方山的好啊。”福建距离京都千万里路，身在异乡的怀恠，心中想念的是家乡的味道。唐宪宗说：“上供些方山茶给朕品尝吧。”在封建社会，皇帝的金口玉言便是最好的广告，方山茶从此名扬天下。

这个故事被南宋福州知府梁克家（1127-1187）记载在《三山志》中，梁克家由此判断：“方山茶得名久矣。”方山茶是什么样的茶，究竟有多好喝，能让一个和尚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1200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喝得到方山茶吗？

茶圣陆羽（733-804）在其所著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就有关于方山茶的记



《茶经》对方山茶的记载

载。他在列举茶产地时写道：“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茶经》特别注释：“福州生闽县方山之阴也。”指明了具体的位置：福州方山的北面。陆羽如是说：“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他喝过方山茶，并且唇齿留香，难以忘怀。后来，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道出了方山茶的名字：“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可是方山在何处呢？古茶树还在吗？

翻开古代典籍，方山其实并不难寻。北宋《太平寰宇记》对福州方山早有记载：“方山，在州南七十里，周回一百里，山顶方平，因号方山。”明万历《福州府志》记载：“方山，一名五

虎，九鼻东向，其高千仞，四面如城郭，有田数百亩。”所以，古时的方山就是今天矗立于乌龙江南岸的五虎山，在闽侯县境内，是旧时闽县、侯官两县的天然界线。

几年前，我到仓山盖山镇参观茉莉花基地，那里正好与五虎山隔江相望。与福州许多连绵的山脉不同，五虎山在江边拔地而起，突兀端方，挺拔俊秀。东面三座奇峰并排耸峙，犹如猛虎仰天长啸，目送江水奔流入海。那一天天气特别晴朗，蓝天白云，茉莉飘香，想起藏在山中的唐代名茶，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在天边。2011年我到闽侯工作，虽然下乡时多次从山下经过，但始终没有机会上山。直到前些日子《闽都文化》邀我采

风，才得以身临其境。

二

五虎山海拔只有611米，和鼓山、旗山比起来实在不算高。山名五虎，但要想把五只老虎都看清，还是要进入闽侯地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市区往南看，五虎山就像一张方方正正的桌子，而到了尚干、祥谦一带，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五座奇峰犹如五只老虎雄踞山顶，俯瞰着七里平原和乌龙江面。但是当越野车开上蜿蜒的山路，猛虎又从视野中消失了。

车到半山，开始往下，进入一个山谷，水



从盖山茉莉花基地遥望五虎山 三米深 / 摄

泥路也变成了黄土路，方山水库跃入眼帘。刚下过雨，山色空蒙，满眼都是碧玉般深浅浓淡的绿色。山峰浸在雾里，倒影落于水面。水库北面是一片稻田，收割的季节过了，显得有些荒凉。山水田园之间只有一户人家，在翠竹掩映下，宛如神仙所居。当地人告诉我，这里名叫方山村，民居后面就是方山寺的遗址。

民居背后是茂盛的果园。果树枝繁叶茂，柑橘沉甸甸地挂满了枝头。几只黄牛在果园里停停走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村民说，别小看这些柑橘，它们可是献给皇帝吃的贡果，唐天宝六年（747），五虎山曾被唐玄宗赐名“甘果山”。方山寺遗址就藏身于果园中，地面上散落着十多根长短不一的圆形石柱。2008年，闽侯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组根据古老的地名发现了这个遗址，除了石柱，还在现场找到了唐宋时期的筒瓦和方砖。

方山寺始建于南朝陈天嘉元年（560），距今有1400多年的历史。《三山志》记载，寺中“有唐贾岛《章敬国师碑铭》”。贾岛是著名的诗人，而章敬国师就是怀惺和尚。据《宋高僧传》记载，怀惺（754-815）姓谢，福建同安人，唐贞元元年（785）礼马祖道一，得其心要，云游北方，元和三年（808）奉召入京，敕住长安章敬寺，并礼请至麟德殿讲经，封为国师。可以说，方山露芽声名鹊起、贾岛为其书写碑铭，与怀惺在禅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而今方山寺已不复存在，《碑铭》也不知所

踪。村民说，20世纪60年代建房挖土时还挖出过佛像，可惜现在找不到了。他一边惋惜着当时的人不识货，一边继续向我们介绍：方山寺唐朝最盛，僧众最多时达2000人。见我们一脸怀疑的样子，他指着不远处的水库说，想象一下，当时整个水库都是方山寺的范围。正值枯水季节，水库露出了部分河床。我使劲地想了又想，一个如水库一般大的寺院是怎样的规模，是多么壮观啊！我不禁发出一声感叹。村民见我听信了他的话，感到很满意，他听说我是冲着方山露芽来的，主动提出带我去看老茶树。

三

意外的是，没走几步，茶树就近在眼前。村民说，方山露芽就种植在方山寺周围。茶树有一人多高，不规则地散布在果树林中，几近野生的状态，完全没有茶园的样子，甚至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茶树上盛开着洁白淡雅的小花，花蕊为金黄色，像栀子花，与我印象中的茶树大相径庭。这真的是老茶树吗？村民却不容置疑地说，这就是方山露芽，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用来制茶喝了，但是树上的茶籽榨出来的茶油实在很不错。

看到茶树的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有些失落。我想象中的方山露芽应该生长于方山之巅、峭壁之上、岩石缝中，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霭，如出世的隐者、得道的仙人。可眼前的茶树实在太不起眼了，混迹于果园之中，满树

的茶花给人不务正业的感觉。再听村民说到茶树无人修剪，无人采摘，只能榨取一些油水，失望之余又有些痛心。一代名茶沦落至此了吗？

后来我看了本茶书，说茶花作为茶树的繁殖器官，会与芽叶争夺养料和水分，影响春茶的产量和品质，茶农往往采用人工修剪的方法抑制茶花的繁殖。所以我们参观茶园时，往往看不到大片的茶花。11月正是茶树开花的季节，与茶花的不期而遇，使我对方山茶产生了独特的印象。

《茶疏》有云：“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五虎山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400到800米的海拔最适合茶树的生长，海拔太低的茶叶滋味不错但香气淡，海拔上千米的茶叶香气虽好但滋味苦涩，五虎山既不太高也不太低。茶树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五虎山雨水充足，森林覆盖率高，方山寺周围山形环抱，能聚拢山岚水汽。阳光透过云雾形成漫反射光，折射后的蓝光和紫光比例高，对



开花的老茶树 三米深 / 摄

茶树里氨基酸、蛋白质和芳香物质的积累十分有利，生长出的茶叶香气浓，滋味纯。此外，茶树与果树和谐共生，茶是名茶，果是贡果，形成生态互补，既能避免阳光直射，又能保证足够的阴凉，而且茶芽萌发之际，果香弥漫于空气中，会被茶叶吸附，制作出的茶就具有独特的“甘果香”。在林中漫步的黄牛，又为茶树和果树提供了天然有机的肥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良好的气候风土，注定了方山露芽品质不凡。

四

站在方山寺的废墟上，我闻着青草的芳香，遥想着寺院旧时的繁华和方山茶逝去的荣光。神秘而古老的方山露芽，是怎样在五虎山中生根发芽的呢？茶在诞生之初，主要作为疗疾之物。有一种说法是，方山露芽是仙人遗种的。五虎山自古就是洞天福地，东晋的《搜神记》就在方山中搜索到了三国时的一位神仙，名介琰，擅长隐身和变形，能时而变成童子时而变成老翁。山中至今还保留着石床、石坛、石棋盘等遗迹。

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方山露芽是由方山寺的僧人创制的。许多历史名茶都和佛教寺院联系在一起。禅宗讲究坐禅和静思，怀惺是著名的禅僧，对“禅茶一味”的道理自然深有体会。茶性平和，使人内心清静，与参禅悟道时的心态异曲同工。而且寺院一般建在深山幽谷之中、云雾缭绕之处，地理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茶树生长。寺院



仙人遗种 三米深 / 摄

为满足僧众的饮用和待客之需，一般都建有自己的茶园。僧人们每日早起诵经，白天采摘，夜晚制茶。他们以云水禅心事茶，不断研习精进制茶技术，使寺院成为孕育名茶的道场。方山寺的僧人在佛前焚香献茶，当茶香伴着青烟袅袅升起，方山露芽就诞生了。

方山露芽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呢？方山露芽是以外形来命名的，它的芽形应该相当好看。有云雾的茶山，茶叶上易凝聚晨露。清明前后，茶树墨绿的老叶上萌发出了细嫩的芽头，昨夜的露水还留在叶片上，青翠欲滴。

唐毛文锡《茶谱》记载：“方山之露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可见方山露芽是大叶种茶，饮用前须先用汤水泡软。由于南方天气潮湿，茶叶容易变质。为了防潮，便于储藏和运输，鲜叶采摘回来后，首先要用热气进行蒸煮，然后捣碎，压造成饼，再入焙烘干，喝

的时候取小块碾碎细筛，最后加盐煮饮。这是唐代典型的蒸青绿茶制法。《茶谱》还说，方山露芽可“治头痛，江东老人多味之”。由此可知，方山露芽既是好茶，也是良药。

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也在诗歌《九日寻臻阁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里分享了品饮方山露芽的过程：“试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黄金。”南宋《施注苏诗》中注引《国史补》，说此“露芽”即方山露芽。宋朝流行点茶，不再将碾磨的末茶放到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筴快速搅拌击打茶汤，使汤面产生乳白的泡沫，宛如白雪，看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奶茶。

五

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方山寺历史如此悠久，规模如此盛大，还出产名茶，后来却突然衰败下去？一般寺院即使遭遇天灾人祸，也是屡毁屡建，现在五虎山中仍有五灵岩寺、正吉寺等重修的古寺，为何唯独方山寺一直无人问津？当地人说，这与古驿道的改道有关。

北宋以前，五虎山是福州往南的主要驿道。古人从仓山阳岐坐船过渡到南通的方山古渡，上岸后翻过五虎山，通往福清、莆田，位于交通要

道上的方山寺因此成为当时福州的大寺之一。寺院备好茶汤，供给驿道上来往的人解乏。过路的旅人、赶考的举子和朝山的香客翻山越岭，走到方山寺时已气喘吁吁，一般都会停下来歇一歇脚，上一炷香，喝一碗方山露芽，茶香在舌尖弥漫，不觉两腋生风。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时。

《三山志》记载：“由南以往，凡五驿、十铺。旧由方山渡。宣和六年，乃出西峡。”北宋宣和六年（1124）驿道发生了重要变化，渡口从方山渡移到了西峡渡。至于改道的理由，书上也说得很明白：江上风大水急，有翻船的危险，而且风浪没有规律，有时要等一两天才能过江。驿道改道后，方山驿道人迹罕至，方山寺变得人烟稀少，日渐衰落，茶叶产量锐减。

但是真正使方山露芽销声匿迹的，是方山寺的消失和贡茶制度的改革。元末明初的那场大火，我是从尚干诗人林枝的《游方山记》中得知：“永乐庚寅仲冬初吉……已而游方山寺，寺已颓，荒秽凄凉，惟余殿基，相与挨石柱以斗力。”可见在明永乐八年（1410），方山寺已毁于大火，只剩佛殿的基座和石柱。方山寺残留构件上烟熏的痕迹印证了游记的说法。方山寺烧毁后，茶园疏于管理。但据明万历《福州府志》记载，五虎山上的茶叶生产还在继续，可知名度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1567-1624）认为“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五杂俎》）明朝以后，方山露芽的制茶水平已达不

到过去的标准。

此时距离怀惺荐茶已过了500多年。事实上，晚唐五代时贡茶中心就移到了建州北苑，宋朝时龙凤团茶名冠天下，元朝时在武夷山设御茶园，方山露芽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罢团饼茶而改散茶进贡，引起制茶工艺的重大变革，杀青方式由“蒸青”变成“炒青”，人们的味觉偏好和饮茶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方山露芽作为传统的团饼茶也随之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清朝时，方山露芽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福州茉莉花茶开始风靡京城。

六

离开方山水库，村民建议我去洋下茶场走走，说那里看上去更像茶园，茶树漫山遍野，拍照效果更好。茶场与水库只隔着一个垭口，位于五虎山北面，正好符合陆羽所说的“方山之阴”。依山开垦的几座梯田上有三四百亩茶树，不过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种的，可惜也已抛荒多年。不大的茶场里坐落着两座小庙：九仙观和通天府。九仙观旁的石头房子据说曾是制茶的工坊，通天府里供奉着蒙天龙王，护佑着山民风调雨顺。

我们遇到了一个修庙的小哥，住在通天府旁，自称来自宁德福安。福安是坦洋工夫的产地，所以小哥对茶颇为内行。他告诉我，知青种的都是菜茶，应该不是本地的茶种，但是他在附



九仙观后的茶园 三米深 / 摄

近的山中见过土生土长的老茶树，树干有碗口那么粗。然后他指着路边的一棵毛竹说，比这棵竹子还高，他以前在老家还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茶树，至于是不是我说的方山露芽，他就不清楚了。我目测了一下毛竹，八九米高，不觉心中一震，莫非真的是方山露芽古茶树？我请求他带我去看看。可是小哥说，那里芒草遍地，需要披荆斩棘，不知还能不能进得去。可惜时间不早了，只能择日再来。

茶树虽然比人长寿，但也有生老病死。如果古茶树健在，是否就能让方山露芽重现人间呢？每个名茶的脱颖而出，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是由茶树的品种与树龄、种植的地理与气候、采摘的时机与部位、制作的工艺与经验共同决定的，其中有些环节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遗憾的是，作为制茶过程最关键的环节，方山露芽的传统工艺失传已久，茶书与方志的记载



洋下茶场制茶工坊 三米深 / 摄

又过于简单，拥有嗅觉和味觉记忆的人早已不在人世。所以茶香易散，茶味难学，即使我们找到了古茶树，把方山露芽重新生产出来，也无法找回当年的味道和茶香了。

五虎山之行，虽然没找到古茶树，没有喝上方山茶，但我的心中并无遗憾，就像雪夜访戴的王子猷，到戴逵门前又转身返回，虽然寻隐者不遇，但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而我带着对历史和自然的敬意，上了古老的方山，又何必一定要寻见方山露芽呢？人与茶之间是有因缘的，如果今生我与方山露芽缘分至此，又何必太过执着？如果要我形容一下对方山露芽的感觉，我会建议他去听一首歌：“山岚像茶杯上的云烟，颜色越来越浅。你越走越远，有好多的话还来不及兑现，你就不见。我身后窗外那片梯田，像一段段从前。我站在茶园抬头望着天，想象你会在山的另一边……”歌词里写的，仿佛就是方山露芽。

心有牧场在山巅

鹿 野

1

泥泞的道路上，越野车艰难前行。

即便不是呵气如雾的寒冷冬日，大概也没几个人来到这山上。

这山和众多你看得见却不一定想要登上去的山峰一样，远远地围绕在我们城市的边缘，你只会抬头仰望它连绵的山峰所勾勒出的水墨一般的线条，而不会妄想着有一天要爬上去。

因为下雨，仅容一辆车的小路更是难走。雨刷不停地挥动，来不及擦去窗上的雨雾。司机行到半山腰，放我们下来透口气。寒冷而清冽的空气一下子蒙到脸上，冰冰凉凉的，真舒服！此时的山峰离我们稍近一些，透过山间的虚虚实实的苇草望过去，显得更加妩媚了。下车走几步，泥泞不说，竟然踩到了牛粪。有人惊叫起来，有人哄笑。有人说这不脏，牛都是吃草的，晒干以后还能当燃料呢，你看高原上藏民们最重要的生活物资就是牛粪，牧民们靠它过冬取暖，烧火煮饭，供神煨桑，建筑家园，还能治疗冻伤，小孩

子可以用牛粪做玩具，甚至艺术家用牛粪制作佛像……踩到的人还是一脸狼狈赶紧往草丛蹭去。

我倒是充满了期待，这山上或许还有人养牛？那可是身处城市难得一见的奇景了。

山是没有峰的，几座山连在一起，有山无峰。五座。于是有人把它们想象成五只老虎，还分别起了名字，小虎、大虎、白面虎、岐尾虎、回头虎。四头小虎就这么保持着生猛的姿态朝向我们生活的城市——福州，有一头个性大概比较调皮一点，它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但这边的伙伴们一叫唤，它又开始向队伍回转头来，所以叫它“回头虎”。

一边听同行的长者为我们讲述这些山的来历，一边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亲近这几座山。

中国人对于山总有种特别的情感，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自古至今的诗作当中吟咏山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山，早已不是冰冷的纯粹作为景观的存在，而是与我们的生活和对生命的感知融为一体，并且被形象化、情感化。大概也是出于一种亲近感，当地人给这些山起了名字，有了名字，就有了一种心灵上的亲近与归属感，这

山便与世人产生了联系。这和西方的童话《小王子》里面所讲的，起了名字就对彼此驯化一样的道理吧。而有了名字的山仿佛被赋予了一种灵性和生命，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五虎山，当然因之五座主峰形似老虎。但也有人形容山无峰，如一方几案，叫它“案山”。又有人觉得从福州市区向南眺望，山峰横亘天际，端方如几，故又称“方山”。还因山上曾盛产柑橘，名之“甘果山”，盛产茶叶，又名之“茶峰山”。你看，不同的人对于这座山有不同的想象与情感，给予它不同的名字。如同我们唤其昵称、小名。我喜欢叫它“方山”，又古雅又清简。

2

到了，车行至半山，有中年人骑辆摩托车为我们引路。越野车左冲右突，从狭小的泥路上

快要跳起来。小路似乎快要到尽处，引路者下车为我们打开一道小小的栅栏。那只是用竹片与细铁丝编在一起，挡在小路上的形同虚设的一道小门。我们都笑起来，这能挡住什么人呢？下得车来，才知道，这道小门并非为人而设，原是为着这柳暗花明的高山牧场中天性自由的鸡、鸭、羊、牛而设。

是的，柳暗花明。栅栏处往里走，倒开阔起来。那条小道所指引着的，是一方水库沿岸的湿地。同行的长者告诉我们，这实际上是火山湖。

我想象着火山爆发，山峰被炸平，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平原和火山湖。又觉得似乎只是在科教片里才看到的情形，不太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但当地的园林部门的专家考证，这确是火山湖。

只是几千年过去，湖水早已归于平静，湖边延伸出的一小片湿地，约有几公里，芦苇、芒



方山水库 三米深 / 摄



方山寺遗址上的果园 三米深 / 摄

花、青缨……草木丰茂。因为刚下过雨，半人高的五花芒的草尖上全是微茫的露珠，无风，也不掉落，连缀成一片，迷迷蒙蒙，大家都惊呼太美了。真感谢这细雨，让人想到新疆的天山牧场，只是比眼前放大了无数倍。

湖边一座房子。

屋旁，有果园，有橘树。正是冬季橘子成熟的季节，不算太大颗的果实挂在树枝上，一颗一颗小小巧巧的，既没有被催红素填充得过分鲜艳亮丽的颜色，也没有膨大剂作用下过分的饱满，像彩色的小灯泡，将这雾蒙蒙的山野点亮。

树下几头小黄牛正在悠闲地吃草。它们看起来年龄不大，但健康极了，毛色棕黄，充满光泽，真漂亮。我们这群山外来客像见到了老朋友一般纷纷要和小牛们合影。它们仿佛见过大世面

的样子，淡定从容，看一眼就继续低头吃草。也有人来疯的护院柴犬，离我们远远地虚张声势地狂叫着，主人喊也不听，大概是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却一点也不构成威胁。几只黑山羊见了人来一下子就跑开了，它们很不好意思，过一会儿又再跑回来瞅瞅，人一靠近，又溜了。

然后是围在一个栅栏

里的遍地的白鸭，以及山坡上自由散步的土鸡，满天飞，有的啄食草地里的小虫小草，有的栖到树上打起盹。真高兴啊，见到这些小动物，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乡野。这小小的牧场也真是像个牧场了。

你瞧，原来主人是要带我们来登顶五虎山，一览众山小的，是要寻找古山遗迹的，却因为下雨天路难行，被我们发现了这山中的秘密牧场。原来以为这巍峨的五虎山只是雄奇的，壮观的，父性的，谁知它竟深藏了如此丰沃的腹地，养育了这么多的生灵。这于我真是意外收获。山也更加亲近起来。

牧场主人同时也兼任着这座山的护林员工作，平时大概是骑摩托车上山来。除了照料这些小动物，还照料着一山的草木。我想象着他每天

的生活，大概早上从山下的家中将饲料带上山，喂牛，喂羊，喂鸡鸭，然后满山巡一遍，看看哪里有松树长虫了，哪里的树木被台风刮倒了，或许还有一片自己的茶园，自己种茶，煎茶，劳作累了，中午小憩的时候给自己泡上一壶野茶，就着山上的青菜煮上一锅粉干、面条，吃完打上一个盹，下午再忙活一番，回到城里。

是的，这就是距我们十里之外的山野农夫的生活。想想也自有一番诗意。

3

中国进入城市化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真正想过去，大多数的我们根还是在农村，在乡下，在山野，只是这些年我们上学、工作，奔着大城市，拼命地想要融入车如流水灯如河的城市生活，我们穿时尚的洋装、皮鞋，买最贵的包，画最流行的妆容，拼命把自己打扮得“洋气”一些，生怕被人看到身上的土腥气。但原始生命中的土气却是怎么也去不掉的，因为你在亲近泥土的时候你是最放松和最坦然的——这就是明证了。

其实生活的方式有许多种，大家不必追寻着一种单一的方式。

古代人梦想的桃花源，今天仍然是存在的。他们也并非躲进深山当仙人，餐风饮露，不饮不食，不是的。他们一定也是要像农人一样锄草耕田，稻、黍、稷、麦，只不过用身体的劳累换取

心灵的休整与安闲。想起永泰山间“水帘宫”里那一对老年夫妇。

在距离福州城不到一百公里的永泰山间，有一处叫水帘宫的景区，游客并不多，山间无车道，自山底到山上崎岖陡峭，步行至少两个小时。一对老年夫妇几十年就在这山里劳作。他们常年住在山巅，种茶种菜，路边支一茶摊，山泉水、野茶，有人上山便卖一壶茶，随喜给点零钱，他们便说谢谢。没有客人时他们用小煤炉熬红豆粥，自家种的豇豆、白菜、芥菜，养几只鸡，煮茶叶蛋，有人买便卖，无人买便自己享用。那一年夏季，我们朋友三人上山，满身疲累，坐在山巅喝他们煮的野茶，清甜芬芳。山间风清景明，请老依伯为我们拍照，他粗糙的手拿过手机，笑呵呵地为我们拍了好几张，山风吹拂下，每个人的表情都意外地欢喜、自然。

有时候时光如梭，改变这个世界，蒸汽、电脑、数字化……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踉踉跄跄几辈子也不一定赶得上这种变化；有时候时间又很慢，几千年下来了，依然有人过着祖先一般的农耕生活，也没见得生命质量就逊色多少。想着方山牧场上的鲜活的生灵们，想着栅栏打开时，牧场主人内心的自得，想着就在我侧身的拥挤人潮中，抬头望得见的五虎山间，有这样一片小小的放牧之地，喧嚣都市所带来的焦虑与躁动便少了一分。

桃花源依然存在——内心的充实与安稳就是真正的桃花源。

闽都文化与千年摩尼教

林秀玉

福寿宫是福州地区目前所见唯一的摩尼教寺庙遗存。

浦西福寿宫又称明教文佛祖殿，现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浦西村，乃1986年修建福州味精厂时搬迁至此。福寿宫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民国《霞浦县志》载：“嘉祐年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灭火，遂灭。遥告众曰：我长溪上万林澄也。”史料中的林澄是当时摩尼教在闽传教的“度师真人”。2009年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记载，林澄灭火后，“三山”百姓为纪念他的救火功绩，“乃立乌山下、闽县右边之庙以祀之”。福寿宫原址坐落在乌山之下和“闽县”的右边，可以判定这座庙宇是福寿宫的前身。

一、构建与布局

从台江宝龙城市广场旁的宁化路中段拐进浦西路，行进一百多米，就会看到写有“浦西境福寿宫”字样的庙宇，即福州浦西福寿宫。从外围看这座寺庙：朱红外墙、飞檐翘角，和福州地区中小规模的道观寺庙无甚差别。福寿宫坐北朝

南，两层结构，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包括前后殿、偏殿、戏台等。正殿外门枋上镶“明教文佛祖殿”匾额，门前左右柱上分别题有对联“真神赐福数浦西有多，明教遗迹普天下无几”，是当时



浦西福寿宫外景



福寿宫供奉的明教文佛像

迁建后的新联。大殿正门前放有一座刻有“明教文佛祖殿”的方鼎。进入正殿，正中匾额“雄风远播”，两侧石柱上刻有楹联“朝奉日乾坤正气，夕拜月天地光华”与“悟彻灵机群沾法雨，参来妙谛普荫慈云”。正殿正中供奉摩尼光佛与度师真人，两侧分别奉有道教三十六天尊。左侧偏殿供奉临水夫人，右侧偏殿分别供奉光华大帝马天君、南海观音和浦西大王神。可谓东西宗教共存，外来本地神明同处。

现今的福寿宫除了宫庙构建和布局与中国传统宗教建筑并无二致外，其信仰内涵也与摩尼教原教义有较大差异。

二、源起与传播

摩尼教又称牟尼教、明教、明尊教，公元3

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是在波斯拜火教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派和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的宗教。摩尼教的核心教义是“二宗三际论”。二宗即明暗善恶，三际是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摩尼教认为初际阶段没有天地，只有明暗二宗，并且它们是分开的；中际阶段，黑暗侵入光明，两者相互斗争；后际阶段，光明战胜黑暗，明暗重新分开。因摩尼教崇尚光明、憎恶黑暗，所以对民众具有吸引力。摩尼教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经西域传入中原。该教拜日月为特征，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明何乔远《闽书·方志域》载：“摩尼教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自唐高宗起至明朝初年，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几起几落直至衰败。尤其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禁止一切异端宗教，浙江按察司检事熊鼎以明教鼓俗眩世，且名犯国号，上奏朱元璋没收其财产而驱其众。摩尼教此番被禁后，在中原地区渐衰。

摩尼教传入福州时间很早。《闽书》所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芳泉郡，卒葬郡北山下”，文中的三山正是福州。

两宋时期福州摩尼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信众之多、影响之大均超过了前代。北宋真宗朝修《大宋元宫宝藏》时，曾将摩尼教经书甄别收录，令福州地区官员搜集《明使摩尼经》，福州士人林世长将收录的经书呈送朝廷后，真宗还授予他“福州文学”官职，反映了宋代对摩尼教的

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南宋文学家洪迈著《夷坚志》中载：“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裳，女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

南宋《佛祖统记》载：“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今摩尼尚扇于三山。”南宋诗人陆游在绍兴年间曾担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和福州决曹，对明教在福州地区的活动有深刻见闻和感受。《老学庵笔记》中载：“闽中（福州）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信教之人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羣，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会，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漫无可取。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摩尼教的传教及其蓬勃发展也使陆游感到

担忧，他指出：“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

勘，福州知州黄裳为雕监。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以溺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滥，未易概举。”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大中祥符重修道藏，明教经典乃得因缘编入。东都盛时，其流盖微，南北之交，斯回复炽。寻其原起，别出三山，盖海播贾胡之传。”信众社会身份广泛，不但有秀才、军兵、吏人等，就连部分贵族士大夫也供奉信仰摩尼教。可见两宋时期摩尼教在福州的发展和规模很可观。

元朝，福州地区依然是摩尼教在南方兴盛的主要区域之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鉴于明教与其国号相冲，遂禁止摩尼教传播并毁其经，捣其宫院。明何乔远《闽书·方志域》载：“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犯民，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杀其徒，毁其宫。”经过这场浩大的灭教行动，绝大多数



晋江草庵

地区的摩尼教基本灭绝，只有极少数地区以秘密方式保存、延续发展至今。如福建泉州晋江的草庵、福州浦西福寿宫等。

三、变异与依存

经过数百年岁月动荡朝代更迭，遗存下来的福州浦西福寿宫还保留了多少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和仪轨？田野调查资料表明，福寿宫的庙祝和信众对摩尼教的基本教义“二宗三际”并不知晓；摩尼教的教规：四不、十戒、三印及忏悔十不当和对僧侣的五净戒等，信众也是不甚明了；摩尼教重要宗教节日庇麻节他们更是全然不知。显然，岁月的流逝，公开宗教活动转为隐蔽的民间信仰进程中，与原发性宗教的长期隔绝导致了现在摩尼教的变异。

然而，在变异中，通过信众手口传承延续至今的福寿宫，却隐藏着摩尼教的基本基因。首先，福寿宫原名“明教文佛祖殿”，而明教是摩尼教在中国的别称。并且2009年霞浦发现的摩尼教经文中对摩尼教祭祀的主神也有“文佛”的称谓；其次，主神神像特征以及楹联内容都明确体现了崇尚光明的摩尼教核心教义。该庙正殿供奉的主神为摩尼光佛和宋代在闽传教的度师真人林瞪。福寿宫正殿楹联：“朝奉日乾坤正气，夕拜月天地光华”，崇尚光明正是摩尼教教义的核心。其三，该庙信众的服饰也保留了摩尼教的遗风。据庙祝介绍，一直到数年前，信众进行宗教活动的

时候还保持穿白衣长袍的教俗，近年来，白衣长袍才简化成了白色上衣。其四，福寿宫信众虽不能完全陈述摩尼教的教规，但是摩尼教的教规对教徒的约束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如，信众们应该遵守“四不”之一的不喝酒，“十戒”中的不诳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忏悔十不当”中的虚伪、妄誓、为恶人做证、迫害善人、拨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等。此外，殿内存有清朝明教文佛像、清朝明教文佛祖殿全景图以及多件铁香炉，绘画、灯笼等实物上均刻有明教文佛和度师真人字样。

四、包容与融合

摩尼教早在唐会昌年间甚至更早时期传入福州并在当地得以发展，反映出闽都文化具有悠久的开放性。闽都文化的开放性生长于福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土壤之上。福州地区三面环山，南部向海，“面海背陆，山海兼备”。旧时陆路崎岖难行交通不便，海洋便成为福州人向外发展的重要通道，福州人对海洋的熟悉、依恋与热爱古即有之。历史上，福州造船业和对外贸易发达，海外移民频繁，都是福州人向海发展的表现。宽阔的海洋不仅仅为历代福州人提供了走出去的途径，也为闽都接纳外来事物打开了窗口。福州排外色彩历来淡薄。以外来宗教的传入为例，异域的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先后传入福州并在当地扎根发展至今。开放性既是闽都

文化的基本属性，也是闽都文化对外来文化包容性、融合性等文化特性的先决条件。

闽都文化的包容性形成于南北交汇的人文历史脉络间：远离中原腹地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州，自古以来便成为中原的世家贵族逃离动乱的落脚地，千百年来一拨拨中原移民不断涌入。随移民带入的外来文化逐一融于福州上古闽越本土文化中，且以其优势改造提升了本土文化，催生了闽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闽都文化对摩尼教的包容表现为传入和发展的包容。摩尼教传入闽都，除了摩尼教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和初始官方不排斥因素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区域文化影响下的民间信众因素，正是长久的开放特质，使得福州民众并不固着于单一的宗教文化，而是对异域宗教持有包容的心态，方使摩尼教进入福州落地传播。

摩尼教传入福州后，尽管也曾遭受过官方多次禁止取缔，但在民间则能够一直保存持续发展至今，跟本土宗教文化与之融合，使之由显性转为隐形的过程分不开。浦西福寿宫正殿供奉的是摩尼光佛和宋代时期在闽传教的摩尼教度师真人林瞪。正殿两侧供奉有道教三十六天尊，侧殿则分别供奉有临水夫人、照天君、观音以及浦西村大王神。这种寺庙神灵布局是闽都文化包容性特质的外在表现。

福寿宫自明朝改建后一直以这种形式发展至今，毋庸置疑，明政府取缔摩尼教的政策使当地信众想方设法保留福寿宫以维持他们的摩尼教信



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全景图挂轴》上的摩尼教文佛

仰，这才产生了披着道教外衣信仰摩尼教的福寿宫。但这种原因只是停留于在外部压力作用下摩尼教信仰的外表变化上，实际上，摩尼教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受闽都文化融合性的浸润，在保留摩尼教自身独特的教义内核的同时，由被动转为自觉地吸纳了闽都诸多信仰的内容与形式。浦西福寿宫摩尼教遗存正是闽都宗教文化在包容基础上相互融合的合重要特性的写照。

福寿宫摩尼教遗存体现了闽都文化历史悠久的开放性，对异域文化如海洋般宽广的包容性和固有区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融合性。摩尼教作为闽都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闽都区域文化。